

# 一二九運動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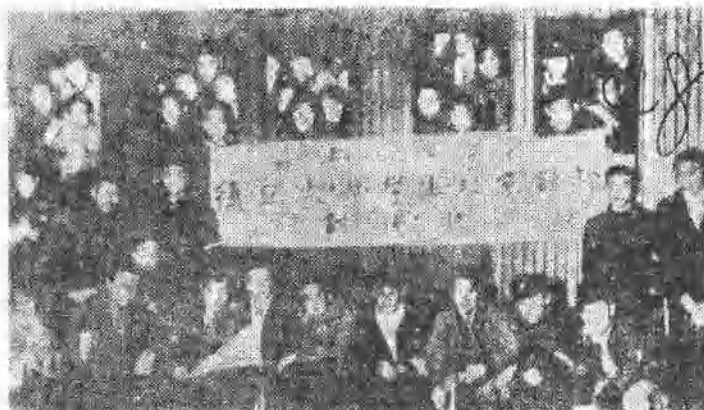
09  
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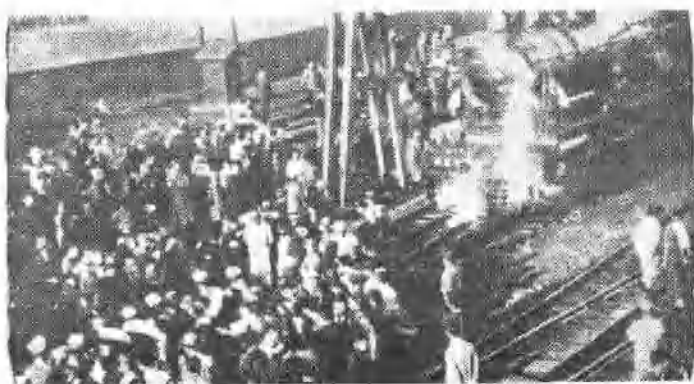
# “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紀念

魏文伯

魏文伯同志為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題詞。



12月23日，復旦大學學生赴北站準備乘車去南京請願。



上海各大中學校學生在北站堅持鬥爭。



12月24日，上海各界数千人示威游行，散发传单。



各界群众举行“上海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



1936年1月，上海各大中学生组织救国宣传团，下乡宣传。

# 目 录

-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2)
-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刘少奇 (4)
- 一二九运动..... (6)
- 一二九运动在复旦.....赵少荃 (7)
- 一二九运动在交大.....许锡璜 (12)
- 一二九运动在同济.....屠昕泉 刘作民 (19)
- 一二九运动在大夏.....余昕 郭敏 袁德齐 向枫 (24)
- 一二九运动在暨大.....陈伟达 (28)
- 不灭的火焰.....王槐昌 柯青 (32)
- 爱国女中的抗日爱国活动.....贾唯英 (36)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学生运动片断.....胡实声 (40)
- 请愿目睹记.....卢栋华 (43)
- 回忆一二九时期上海抗日救亡  
运动的发展.....胡子婴 (47)
- 往事重温.....魏璐琦 (52)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中学联.....秦建君 (57)
- 一二九运动中的全国学联.....  
.....刘璣章 柳淑卿 秦建君 (61)

#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

## 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节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毛泽东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

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队伍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中华报》，原题为“毛泽东同志演词节录”。

#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纪念

“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刘少奇

自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黑暗反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九年之后，除开在乡村中的武装革命运动外，在城市中又开始了带有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涨，那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运动所直接引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由此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救国运动才达到新的高潮，并一直继续到现在。虽然在目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策的重新施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运动曾再度消沉，但这仅是部分的现象。所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尽管这个运动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实现“一二九”运动的基本口号：“一致对外”、“中国完全独立”。我们坚信这些口号与要求，

将要达到胜利。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由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这中间有十九个月，在当时反动统治的城市中保持这个新起的革命运动不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是有一些困难的。但它是保持下去了。这首先是由于执行了一种谨慎的正确政策的结果。保持“一二九”运动所发动起来的学生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聚积起来的革命力量，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因为有了新的全国抗战的局面，才取得了广泛开展的条件。城市中的革命学生才能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和工农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因此，就使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大多数青年，现在大部分已成为敌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负责人以及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指导者了。他们在今天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站在各方面很重要的岗位上，为他们在“一二九”的愿望而进行着很有效的斗争。相信他们不久的将来会以胜利者和主人的资格，回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骄傲地叫着“中华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这是他们在“一二九”时曾经叫着的口号。由此可见，单纯的学生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反动统治之下长期坚持。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 一 二 九 运 动

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今并入河北、山西），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个卖国阴谋使北平的学生怒不可遏。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共产党的抗口救国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敢地起来战斗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6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用木棍、大刀和水龙向学生们袭击，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三万余人，再次举行大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这一天，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更残酷的镇压，有30多名学生被捕，近400人受伤。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又遭到镇压，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怒。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西安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平、津学生立即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与此同时，党还在先进青年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为抗战爆发前后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 一二九运动在复旦

赵少荃

五十年前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并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上海，具有爱国反帝传统的复旦大学学生，勇敢地行动起来。

十二月十二日，复旦大学同学举行集会，致电北平各大学学生会，对北平学生爱国行动表示“万分同情”，主张：（1）反对华北自治；（2）讨伐汉奸殷汝耕；（3）青年应有救国的自由；（4）全国青年应一致响应北平学生号召，誓为后盾。十四日，复旦和其他大学一起，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同时发表通电，声援北平学生。

## 两次赴市府请愿

十二月十六日，郑通鹭、李广政等同学发起组织复旦同学救国会，虽然遭到国民党CC分子的捣乱破坏，但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进步同学的支持下，终于组成了救国会，并推选杨伯鹏同学等负责救国会的工作。十七日，北平学联派清华大学的韦毓梅（女）、陈元、燕京大学的陈翰伯来到上海。韦毓梅等人向上海各校学生代表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要求支援。复旦代表回校后，于十九日召开全校同学大会，会上除介绍北平情况外，一位同学作了“报国有志、请缨无门”的讲演，另一位北平同学讲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得全校同学热血沸腾，决定一面联络其他学校，一面立即赴上海市政府请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被迫出来接见复旦、持志、同德医学院等校学生，答应将学生所提：“取消华北自治组织，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惩办压迫学生运动的官吏，保障学生爱国运动，讨伐殷逆汝耕”等条件，如实转报中央，并以书面盖章签字，交与复旦同学。这样，

同学们便各自回校了。

在复旦等校同学赴市府请愿以后，国民党上海党部听说全市各大专院校学生将在江湾体育场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感到学生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了的，于是决定抢先行动，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使学生的影响尽量缩小。他们指使暨南大学的特务分子组织大专学校学生赴江湾新市区上海市政府“请愿”，同时具体规定：同学所走的路线为荒郊僻壤，时间在深夜，并且不准喊“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等口号。对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暨大爱国学生骨干胡夏育、陈伟达等人研究，决定采用“将计就计”的办法，让国民党分子去组织，爱国学生也跟着参加。

暨大七百余名学生，会同交大、大夏、光华、大同、税专等高校爱国同学八千余人，冒着刺骨寒风，在漆黑的马路上由徐家汇步行，至凌晨三点多钟到达复旦，复旦同学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稍事休整后，复旦同学也和大队伍一起，再次赴市政府请愿。

#### 直赴南京请愿

经过两次向上海市政府请愿，复旦同学感到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直接到南京去请愿，以扩大影响。

十二月廿三日上午十时，复旦救国会体育馆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会上一致同意立即赴京请愿，迫使政府抗日。于是四百多同学高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大旗，奔赴北火车站。国民党市政府事前得悉即派出大批军警沿途设置铁丝网、进行阻拦。复旦同学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中午十二时许终于到达北站，随即登上一时二十分开往南京的特别快车。但是上海铁路局接到国民党中央命令，将京沪、沪杭各次列车全部停驶。这时陆续到达北站的复旦同学已达八百余人。市政府调动军警包围车站，甚至派警察将同学拉离车站。但是，复旦同学坚决不回学校。他们表示“此次本校赴京请愿，其目的为反对变相的伪自治、要求政府立即动员讨逆，如不达目的，永宿北站，誓不回校。”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教育局长潘公展到场劝说学生回校，均无效果。

上海市长吴铁城遂将此事报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蒋打电报给复旦校长李登辉，请李劝同学回校。李登辉被迫于下午三时许到达北站劝慰同学，同学们高呼：“拥护李校长！”，“请李老校长

回校休息！”仍然要赴京请愿。这说明复旦同学既热爱自己的校长，更关心祖国的命运。

复旦同学赴京请愿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晚暨南、大夏、沪江、光华、交大、持志等校同学均派代表携带面包、饼干、桔子等物品前来慰问，更加坚定了复旦同学的决心。东南医专的同学还冲破沿途军警的层层阻挠，赶来北站参加请愿。次日，暨南、同济、大夏、中国医专、上海法学院等高等学校，复旦实中、新亚、市北、武陵、建国等中学及黄花冈小学的学生也都列队前来参加晋京请愿的行列，学生总数达三千余人。

面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他们调集大批军警前来包围学生，宣布局部戒严，准备镇压。但是学生的爱国壮举，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国民党元老何香凝亲赴火车站慰问晋京学生，并挥泪作书云：“谨赠同情爱国之心，并请为国自爱。”她警告荷枪实弹的军警说：“不许向青年们打一枪”，“决不容许伤他们一个人。”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有所顾虑。

#### 学生自己开火车

至此，京沪、沪杭两路火车，已停驶近三十小时。国民党当局另耍花招。下午四时半，公安局长宣布火车直放南京，愿去的同学立即上车。可是，火车开到青阳港后，司机即奉命离去。国民党原计划在此郊野，用武力胁迫同学回校。不料，复旦土木系一位广东籍同学曾在其父的煤矿里学开过小火车，这时毅然出来开车，车子终于慢慢开动了，同学们欢声雷动。

但是，国民党为了阻止同学前进，竟然派人拔去道轨铆钉，企图造成翻车事故。幸好铁路工人前来报告，同学遂将铆钉重新铆上。以后，国民党又遂毁拆去铁轨，甚至把铁轨丢到河里。同学只得冒寒下水捞上铁轨，把铁路修复，继续前进。车到昆山，该站站长借了一部压道车给同学，让同学派人先行开道，以保证行车的安全。

二十六日晚上，火车刚过无锡不到十里，遇到一座铁桥，这里的铁轨拆得更多，迎面又停着一列三十八节的火车，宪兵司令谷正伦率领三团宪兵前来阻拦同学。宪兵们逮捕了学生代表和修路同学王拔山等人，并将列车团团围住，要同学返回上海。一时秩序大乱，同学们

纷纷下车，表示决不回上海。

二十七日凌晨，无锡丝厂工人来慰问同学，并送包子给同学吃，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沙千里、史良等人也来慰问大家。晋京同学便在上海市内举行示威游行。经过五天四夜的斗争，同学们都已精疲力尽，有的脚都肿了起来。同学们在无锡市内游行以后，到中南大戏院召开临时大会。但是同学们刚进去坐定，外边就被重重包围了起来。当时，国民党派了复旦毕业同学、行政院秘书长端木凯前来劝导同学回校。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坚持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释放被捕学生，然后才同意回校。国民党被迫放回了被捕学生。在宪兵的“保护”下，全体学生被送回上海各校。

这次晋京请愿，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使京沪铁路中断近一百小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在实际斗争中，也提高了同学的觉悟。

### 下乡宣传抗日救亡

同学们回校后，学校就奉令提前放假了。国民党放假的目的是瓦解学生救亡运动。但是，复旦许多同学却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利用寒假时机，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上海学生下乡队伍共约九十人，分为三个中队，其中复旦人数最多，单独组成第一中队，由裔寿民、史亚璋等同学负责。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捐款二百元、秘书长金通尹捐款五十元，以支持同学们下乡所需的印刷品经费。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复旦同学便在“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的旗帜下，由南翔向嘉定出发，沿途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讲解国内外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抗日标语，傍晚到达了嘉定。第二天清晨，抗日宣传团排队绕嘉定一周，向群众宣传后向太仓前进。在太仓，同学们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向各界募捐得款近百元。廿五日，同学到昆山宣传时，受到当地公安局长的恫吓和威胁，同学们和他们展开了说理的斗争，使他无言可答。在昆山，同学们向由十九路军改编的部队进行了宣传，在宣传队离开昆山时，他们还专门前来送行，高呼“欢送上海学生”的口号。

廿七日下午，抗日宣传队到达苏州。苏州城门紧闭，同学们翻过

城墙缺口，打开城门而入。后来苏州县政府派人招待同学住进苏州工专宿舍。二十八日凌晨，国民党派来大批军警，武力押送同学返回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复旦同学回校后，立即投入了纪念“一·二八”的活动。

### 坚决反击“三·二五”迫害事件

由于复旦同学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站在运动的前列，影响全市，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痛恨，决定用武力来进行镇压，这样，就发生了“三·二五”事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上海市军警当局出动五、六百人，包围复旦大学，并从校外宿舍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郑通鹭、江男俊、包毅、黄拔山、杨伯鹏、莫自新、蒋文蒸等七人，又派女探员乔春华到女生宿舍抓人，被同学发现后加以扣留。当天下午，大批军警冲入校内，逢人便打。当时，李登辉校长、金通尹秘书长、文学院院长余楠秋等人前往劝阻，亦被军警殴击。学生大怒，奋起反击，将军警全部逐至校外。军警遂在校外开枪，自己误杀警察一名，反诬复旦学生所为。幸好当时复旦学生邵素，冒充军警人员，拍有现场照片，使军警方面无从陷害。二十六日上午，军警当局借口校内有共党分子，藏有枪支，要求进校搜捕，结果一无所获。但军警仍然继续包围学校。对此，李登辉校长强烈抗议国民党的迫害和诬陷，公开声明：“复旦学生救国会始终与学校当局合作，他们主张急起抗战，这点本人亦深以为然。”积极保护救国会干部。

在李登辉的要求下，复旦大学校董孙科、钱新之、杜月笙、叶秉孚等人召开临时校董会，对军警当局扰乱学府、摧残青年、利用职权，混淆是非的行为，非常不满。会后，他们一起去责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吴见势不妙，承认发布新闻，诬指复旦学生枪杀警察是错误的，保证以后决不派军警进校搜查。上海各界救国会也多次发表宣言和意见，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在各方面的反对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全体被捕同学释放。复旦大学的反迫害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交大

许锡璋

“九一八”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受破坏，但是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仍在继续活动。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是一九三四年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号召而成立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武卫会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作为抗日救亡的领导力量之一在人民中秘密活动。徐昌裕和我是上海交大唯一的二名武卫会会员。当时，交大党组织已被破坏，一九三四年武卫会小组成立后，就成为领导交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了。

## 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酝酿和发展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武卫会在学生和店员方面的领导人杨成祺来到交大，在隐蔽的竹篱笆旁，同我们讨论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形势和上海交大响应这一运动的可能性，并商定响应的方案。当晚，在操场东侧的树丛里，我们召开了武卫会领导下的读书会成员会议。读书会的成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有正义感的同学，如钱保功、姜治光、夏锡钧、范元弼、叶佩兰、陈和英、周来芬等。会议决定，各自回到自己班里召开班级会议，并提议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成立学生救国会，对抗由CC特务把持的交大学生会，以领导交大的救亡运动。

会后，徐昌裕和我立即去找自动工程系乙组的班长王裕齐。徐昌裕把北平一二九运动浪潮波及全国和上海的情形，向王裕齐作了详细介绍，并且说：“最好由你出面召开一个全班会议，在班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向全校建议召开全校代表大会讨论响应北平的运动；第二是由你提名我们两个担任我们班的代表，来发动这个运动。”王裕齐当场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天晚上，我们分头在各班的宿舍活动。我在中院宿舍里碰到钱保功、姜治光，并知道钱已被选为化学

系一年级的代表，姜被选为物理系一年级的代表。后来，又了解到范元弼是机械系三年级的代表，夏锡钧是物理系三年级代表，陈和英是物理系四年级代表。

经过多方面工作，按照原定计划在工程馆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按照原定意图成立了交大学生救国会，以取代CC特务把持的御用学生会。救国会的委员是郑宣知、李震声、周世正、董寅初和我。郑宣知为救国会主席（后来才知道他是CC分子）。郑宣知所以被推为主席也是我同徐昌裕商量后在会上提出的，理由是郑宣知是土木系四年级学生，班级最高；他能演说，会写一手好文章，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表示过爱国，态度激昂；他反对学生会的CC头子杨训政（其实是伪装的）等。这时，交大同学中的两派斗争相当激烈。一方面读书会的成员，在各自的班级积极活动，商议如何响应北平的爱国运动；如何同上海各大学统一行动，如何召开全校大会发动罢课等；另一方面以杨训政领导的学生会，配合训育处陈嘉勋等也到处活动，为蒋介石辩护，说什么“政府对日抗战早有决心”、“要相信政府”、“不要受异党分子利用”等等。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救国会在校体育馆召开了学生大会。会上首先发言的是钱保功，接着是姜治光、夏锡钧、范元弼、徐昌裕和我。大家一致表示要响应北平和上海各大学学校的行动，要求交大立即举行罢课，参加上海市的示威游行。这些要求都为大会举手一致通过。

### 向江湾市政府请愿，蓝衣社破坏救亡运动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徐昌裕通知我一起去上海税专找圣约翰中学的老同学胡实声。在税专的一间大宿舍里，胡实声告诉我们上海要成立一个地下学联，主要同CC把持的上海学联相对抗，交大代表就是徐昌裕和我了。当天，就在这个宿舍里召开了有税专、复旦、持志、光华、交大等十余所大学的代表会议，成立地下学联，由税专和复旦主持，组织大专学校的抗日统一行动。最后还决定发动一次大中学校大规模的宣传活

我被武卫会指定为大中学校联络员，又被交大救国会指定为全



校学生宣传行动的总指挥。在复旦大学教室里，由地下学联主持的一次会上，决定于十二月下旬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市各大专学校抗日救亡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

一切准备就绪。突然在预定行动的前一天傍晚(十二月十九日)，交大校园里响起阵阵钟声，经久不停。同学们拥到操场上，只见暨南大学和其它学校来的学生数百人，列队在操场上喊口号、唱歌，说是要去江湾市政府请愿，钟是他们敲的。同学们自动来到操场，听候救国会的决定。救国会主席郑宣知很快在体育馆里召开了全校学生的紧急会议，决定和暨大同学一起行动。

突如其来的事件，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原地下学联布置的统一行动，必将遭到破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没法搞清，与徐昌裕商量也来不及。为了挽回局面，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发言：“暨南大学这个行动同我们预定的行动是不一致的，我们不能同意跟他们走。”当时会场里有人发出嘘声，企图制止我的发言。最后，我再次站起来，抢了一句：“我们坚决反对跟他们一起行动。”徐昌裕也站起来支持我的意见，会场里争论十分激烈。就在这个时刻，心怀鬼胎的郑宣知作了蛊惑人心的总结发言，并利用表决的方法，骗取群众跟随暨大一起行动。

于是，队伍跟着暨南大学同学，走到持志、税专，最后走到复旦，逢处敲钟，到处呐喊。我在队伍前后奔走，好不容易找到税专队伍的胡实声。听他说了一句：“我们上了蓝衣社的当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次行动，显然是蓝衣社预谋的行动，他们突然袭击，抢夺群众队伍，进行疲劳行军，使我们第二天的宣传活动遭到夭折。

我把胡实声的话，传给了徐昌裕。他沉默地点了点头，没有言语。队伍不停地前进，路上一片黑暗。徐昌裕在黑暗中，轻轻地说：“这样的行动，大家会认清蓝衣社的面目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队伍到达了江湾国民党市政府大楼门前。人们席地而坐，疲劳笼罩了一切，愤懑、懊恼在无边的黑暗中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这时，徐昌裕同我和钱保功、姜治光等商量，决定展开一次活动。徐昌裕在人群中说：“真倒霉，一夜疲劳行军，完全上了暨南蓝衣社的当，他们真狠毒，把人拖垮了，破坏了预定的计划。”

我也接过来：“疲劳行军，一夜见不到人，连鬼都没有看见，向谁宣传，向谁示威游行？”人们议论纷纷。等了好久，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出来接见。于是，从暨南大学人群中挤出了一人，恭恭敬敬地向吴铁城呈上一份“请愿书”，并宣读什么“向吴市长致敬，拥护国民政府安内攘外，复兴中华”等等，听了令人恶心。吴铁城频频点头，表面上支持学生行动，并要学生相信政府，拥护政府等等。这场闹剧使广大的同学们认清了蓝衣社的真面目。国民党妄图控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是控制不住的，学生们反对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主义，要求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喊得更响。第二天，麦伦、正风、爱国等中学生会相继去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请愿示威，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烧，想抑也是枉然。

### 上海大中学校寒假宣传团

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地下学联组织开过几次会议，决定搞一次寒假下乡宣传抗日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分散学运力量、提前放寒假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发地点是上海南翔，目的地是沪宁路沿线，采取的方法是徒步深入沿路县镇宣传抗日，帮助民众组织抗日救国会，行动组织的名称是“上海市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宣传团。”

一月二十一日，在南翔集合的有复旦、大同、大夏、持志、税专、美专、蒙藏等学校的学生，其中复旦大学参加的学生人数最多。在一所中学里，宣传团召开了一个各校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宣传团不设总指挥，下面成立三个中队，每个中队长轮流担任大队长的职务，并决定沿公路线开展宣传活动。

队伍沿着沪宁公路行进，沿途经过安亭、昆山、正仪。除夕前夜，到了唯亭。晚上，宣传团在唯亭小学住下，大家不顾几天的疲劳奔波，抖擞精神，展纸磨墨，写抗日春联：“抗日救国，接福迎春”，“炮火千声降日寇，桃符万户迎新春”。第二天，在街头巷尾为老百姓贴春联，讲抗日故事，唱救亡歌曲。晚上，在唯亭小学的礼堂里，演出交大自编的活报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的罪行，台上演员声泪俱下，台下观众心情激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冲破了黑夜的沉

寂。最后，队员们协助当地群众组织了救国会筹备会。

自南翔出发后的第七天，宣传队开到苏州城东门，城门紧闭，尽力呼喊，也无人理睬，队员们搬来大木桩，十几个人抱起向城门冲撞，城门仍然不动。城门右侧，有二三根木桩斜搭在城墙上，手随着三名团员，攀上木桩，爬上了城头，沿城头的石阶跑下城门，从里面拉开铁栓，二百余名宣传团员一拥而入，冲进了苏州城。热闹街心挤满了人群，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奔跑而来的上海学生。

税专的胡实声第一个拿来一条长凳，跳上去就高声喊起来：我们爱国无罪，已经一个星期从上海到苏州，没吃没睡，宣传抗日，难道有罪？爱国救亡，难道有罪？胡实声讲得慷慨激昂，听讲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妇女送来面包，有的老人送来开水。接着，徐昌裕也跳上长凳，讲了几句，讲得脸耳形红。

队伍穿过小街，到了苏州县政府门前，时已傍晚。宣传团员一天行军斗争，又渴又饿，但是口号声不停，歌声不绝。“我们要见苏州县长！”“救国无罪，抗日有功！”“我们要县长出来！”“不出来就是汉奸！”于是，县长不得不出来。在大家的口号声、歌声、斥责声中，县长见势不妙，趁机又溜了回去。

夜深了，有人在离苏州县政府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学校，于是宣传队员集合起来，在学校二楼学生宿舍，四五人一间住了下来。大家一天奔波劳累，不久就沉沉入睡了。

突然，一群特务、警察闯进学校，许多学生惨遭毒打，有的被当头一棒，打昏过去。特务在我们的房间里，把大衣、毛线衫、日记本、照相机全部抢走，沿途记录宣传活动的照片，也被他们一抢面光。宣传团员一个个被连推带拉地赶下楼来，两个警察挟一人，押出校门。大家昂首阔步，迎着东方的微白，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警察制止唱歌时，大家大声责问：“我们爱国无罪，难道你们不主张抗日爱国吗？”“中国人不抓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警察把宣传团员都押上火车送回上海。宣传团虽被押送回沪，但沿途撒下抗日救亡的种子，有待来春生根发芽。

回到交大第二天，郑宣知板着脸孔，气冲冲地质问：“你们怎样

回来的？”我们回答：“在苏州被特务押回来的！”他又喊：“叫你们不要去，你们偏要去，叫你们不要闹事，你们偏要闹事！”我们说：“抗日救国，闹什么事！”他又骂：“你们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只有日本鬼子才打中国人，只有汉奸才打中国人，难道你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吗？”这样，郑宣知的面貌完全暴露，狐狸尾巴再也掩不住了。

### 地下学联再次组织赴南市宣传

从苏州回来一个星期后，地下学联再次组织赴南市宣传抗日救亡，所举的旗帜，仍是“上海市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宣传团。”

二月八日下午，各校一、二百人齐集在太阳庙沪太路汽车站内，预定二时出发，只因暨南大学弄错了地点，宣传品不曾带来，等到三时才出发。队伍分成四人一小队，每人分担题目，轮流演讲。宣传队经过新民路，跟随的群众已有千人以上，队伍转到北站，已经是下午六点了。于是，在北站广场召开了二千人的市民大会。大会主席宣布：前天杨树浦日商纱厂又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中国人只有团结在一起，抵抗他们的压迫，才能得到解放。会上提出全市罢工罢课，推举了四个代表联络各界人士；同时还推举出九人，组织闸北民众救国会筹各会。第二天，也是下午，队伍在南市体育场集合后进行游行。当大家来到唐家湾，一层层警察排成横队，人群象怒潮一样向警察压过去，对抗了十来分钟，警察被冲散了。但警察绕过队伍的前锋，又和队伍发生冲突，结果队伍被打散，有人被捕。大夏大学姓聂的同学和我向警察进行交涉，要他们释放被捕的同学。复旦两位女同学被拖往警察分局，我们赶去拦住，女同学乘机逃脱，我们被关进了警察局。被关进去的还有大夏、税专、泉漳中学、江西中学的学生约十人。警官对我们进行了审问，也没有什么结果。晚上和第二天，各校陆续派人将学生领回。

### 上海学生救亡运动座谈会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地下学联通过税专的彭瑞复，通知徐昌裕和我，参加一位美国进步作家召开的上海学生救亡运动座谈会。

为了避开特务的盯梢，约定分散在四川路桥堍新亚饭店附近等候。但是，又因不安全，临时通知改在这位作家的寓所里进行。

下午，在法租界卢家湾附近一所西式公寓三楼找到了这位作家的住所。屋内围着餐桌已经坐着十来个青年，他们是税专、复旦、持志、光华大学的代表。这位女作家自我介绍是一位女记者，为美国和德国进步报刊写稿，愿意把上海进步学生的救亡运动情况向国外报道。

代表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争相发言，报告了地下学联怎样同CC控制的官办学联相对抗；怎样组织赴苏州下乡宣传，同特务斗争；怎样又组织了两次宣传，在唐家湾同警察发生冲突；复旦怎样被警察包围，断绝了外界联系等等。座谈会散会以后，我同徐昌裕对这位作家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发生兴趣，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地的女儿》贪婪地翻阅着。女作家说：“你们喜欢这本书吗？是我写的。”“那你就是一……？”“是的，我就是爱舍纳斯·史沫特莱。”我们听后，激动地紧紧握住她的手，以见到一位大作家而觉得高兴。

史沫特莱又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我们不看犹可，一看简直吓了一大跳，这厚厚精装硬面书皮上烫着几个金光大字《中国红军在前进》——A·史沫特莱。翻开一看，里面尽是关于中国红军战斗的短篇故事，并附有不少实地战斗的照片。

于是，几乎每隔一、二星期，我们都要乘电车从徐家汇摆脱特务盯梢，来到这个高楼看望史沫特莱，听她讲述中国红军在苏区的战斗及阅读《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本书。有一天，我们要求她介绍去见鲁迅。她说：鲁迅患肺病，十分严重，这里环境很坏，对他十分不利，对他的身体更有害，国民党法西斯迫害他，托派暗害他，我劝他出国疗养，高尔基请他去苏联休养，他都不去，绝不放弃战斗。她又说：日寇要他走，他偏不走，免得他们说他接受卢布，真是坚强的革命战士。一天，我们又要求史沫特莱介绍我们去见苏区来的共产党员。她给我们约定在霞飞路口一家法国咖啡馆里会面，因那位同志临时有事，没有见到。后来，那位同志化装成“包打听”，携带史沫特莱的介绍信来到交大宿舍找我们。从此，我们与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聆听他对苏区和工农红军情况的介绍。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我于交大毕业后离开上海，在革命征途上进行新的战斗。（柳淑卿、刘璩章、郝喜兰一九八〇年十月整理）

# 一二九运动在同济

屠听泉 刘作民

在华北局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主张。同济有些学生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看到了《救国时报》上登载的《八一宣言》，很快地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同济大学工科学生顾德熙（张凡）由于其兄顾德欢（在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关系，与上海文总建立了联系。文总的陈延庆（王翰）、唐守愚先后到同济指导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青年团。参加者有顾德熙、李滢来（朝鲜籍学生）、汪珊（汪海粟）、孙永德、杨礼耕、胡敬伦等八、九人，形成了一个领导同济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并团结广大同学，逐步建立和扩大新文字研究会、无线电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北平学生一二·九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的消息传来，把同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十三日，学生们以同济医工学会的名义，分别向北平学联和各界人士发出快邮代电。致北平学联的电文说：“你们发起了这伟大的运动，你们的态度正代表了全国青年的意志，我们誓以我们的热血同力量，和你们（一起）来完成这救亡的工作。”致各界人士的电文提出：“我们要一致起来援助他们，坚决的反对这种暴力和一切破坏国家完整的组织，我们要求北平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十四日，上海各大学学生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同济学生汪珊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推选为干事会七名干事之一。这次会议发表救国宣言，通电声援华北学生爱国运动，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华北一切傀儡组织，保障国家领土完整；还发电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爱国运动和言论自由。

十二月十六日，北平爱国学生一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抗

日示威游行，又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消息传到上海，广大学生怒火中烧，立即酝酿罢课和示威游行。十九日晚上，同济和上海四十多所大中学校代表数千人在交大集会。晚上九时许，游行队伍开始上街。途径安和寺路的汪精卫和曾仲鸣的住宅时，学生们握紧拳头，振臂呐喊：“打倒卖国贼！”愤怒的口号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第二天凌晨三时，游行队伍到达复旦大学，休息片刻后，又继续向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前进。清晨五点半钟，学生队伍到达目的地，上海市长吴铁城被迫出场。他先假惺惺地表示“慰劳”，接着大讲学生爱国运动“必须严守纪律秩序”，“不要荒废学业”。学生游行队伍主席团严正提出书面要求：制止华北军政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殷汝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护上海爱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等等。在广大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吴铁城不得不表示“保护上海爱国运动”，并负责将其它要求呈报国民党中央。于是，学生队伍继续到别处游行，直到黄昏。

在这次示威游行的基础上，有些学生提出直接到南京去请愿，上海地下党组织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的要求，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高潮。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北大南下宣传的学生来同济联系，要求支援。德文补习班李鑫（李欣）闻讯后，当即奔向钟楼，拉起了钟绳，急速敲打。广大同学听到紧急钟声，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听取北大战友介绍北平学生两次示威和受到镇压的情况。大家热血沸腾，满腔怒火，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再也不能容忍了。

上海的文化、妇女、学校等各界救国会决定，于二十四日在南京路上联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同济德文补习班的学生得到消息最早，行动最快。这天清晨五点钟，他们就由班长吴光率领，带着一批宣传品，乘上淞沪第一班车到达北站，途径河南路，穿过公共租界铁栅栏门，来到南京路大陆商场（今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所在地）附近。这时，南京路和附近马路上已是人群来往，熙熙攘攘。八点钟光景，几下爆竹声响，数以千计的人迅速集中起来，旗帜、横幅立即展开，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和纱厂女工站在队伍的前列，大、中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后面紧跟。游行队伍一边

散发传单，一边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踏着“五卅”先烈的足迹，在南京路上迈步前进。

二十四日早上，当同济学生会知道一部分学生已去市区参加示威游行后，立即开执委会进行讨论。有的执委主张支持北平学生的革命行动，立即率领全校同学罢课游行；有的不主张罢课；还有的提出，到吴淞镇去走一圈就返校。由于当时学生会执委中，进步力量不占优势，因而决定不下来。上午十时左右朱洪元同学紧敲学校大钟，正在教室听课的同学们，顷刻集合在钟楼前，自动组织起来，每十人组织一个小队（即“十人团”），推选一个负责人。几十个小队组成一支游行队伍，向吴淞镇走去。他们路过中学部，就招呼中学同学一起乘上淞沪火车，直驶北站。

这天下午，高职机械科一班班长邓创之获悉同济大学部学生要去南京请愿的消息，立即找其他五个班的班长商量。大家认为，应该立即动员同济大学高职同学参加。于是，由六个班级的班长迅速集合全校学生，打起旗帜，扛着横幅，从江湾跑一段，走一段，唱着军歌、喊着口号，途径天通庵火车站，大家看到路南的日租界，日帝正密布重兵，寻机挑衅，学生们义愤填膺，加快步伐，赶到北站。这时，德文补习班的一些同学和稍后赶往南京路的测量系纪增觉等同学均已先后到达北站。北火车站正被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着。复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已经在前一天进入车站，与反动派进行了一昼夜的斗争。同济不少学生提出：“我们也到南京去请愿！”于是，同济学生高唱《毕业歌》，手挽手地冲进了站台。计有大学部近百人、高职三百多人，附中近二百人，合计五百多人。复旦等校的学生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大家不断高呼：“爱国学生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死汉奸！”满腔怒火，越燃越旺。

当时，上海各工会、文化团体、各界救国会的代表带来了食品，陆续前来慰问学生。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也买了两卡车面包，抱病到车站慰问。国民党军警用枪支前来阻拦卡车，何香凝十分愤怒，她义正词严地对军警说：“你们拿着枪杀人成性。你们杀了多少人，不能再杀我们的后代！我老了，你们要杀人，就向我开枪好了，一百枪也行，一千枪也行，但不许向青年们开一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



决不许伤害他们一个人。”军警们听了，不得不让装载面包的两辆卡车开进车站。当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车站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受“坏人利用”时，何香凝气愤地指着他说：“学生们要求抗日，是爱国的！要说坏人，坏人就是你！”各界人士的慰问和鼓励，大大地增强了学生们斗争的决心。学生们不畏手持步枪刺刀的保安队的恫吓，也不顾手举棍棒的警察大队的吆喝，二千多名大、中学生坚持斗争，终于登上了两列列车。同济等校学生乘坐一列车，复旦等校学生乘坐另一列车。

这时，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打电报给上海车站站长，要学生“务宜即刻回校求学。”车站当局将蒋介石来电在每节车厢里宣读，学生们不予理睬。吴铁城、潘公展等眼看学生赴京请愿志坚如钢，无法阻挡。于是，他们假意允许开车，暗中布置了钉子，预谋途中把列车折回。这时同济校方也派教职工代表前来劝阻，同学们坚决不答应返校。

一会儿，站台上高音喇叭里发出通知：请各位学生注意，到南京去请愿的同学请坐好，不愿去的马上下车回校，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通知接连播放了几次，没有一个学生下车，两列火车徐徐开动了。复旦等校学生乘坐的一列车先开，同济等校学生乘的列车跟在后面。

在前进途中，同济学生乘坐的列车突然在青阳港停下，司机借口机车有故障，要下去检修，结果溜走了。在车头上值勤的几个同济学生下车找不到司机。同济两名学生爬上车头检查，发现锅炉里的水被放走了一半，炉膛里火烧得不旺，于是就根据平时学到的蒸汽机原理和到机车修理厂参观实习的经验，首先加煤把炉膛烧旺，接着拨动前进档，用低速把列车朝着昆山方向驶去，车行慢如牛步，直到午夜，在大雪纷飞中到达昆山。这时，昆山站内已有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上海保安队士兵散布在钢轨上，阻挡列车前进。当夜雪下得越来越大，车厢里没有暖气，同学们早已饥肠辘辘，但大多数人毫不气馁，只是痛恨反动派阴险毒辣，设下了这个骗人的圈套。

第二天清晨，学生们冒着鹅毛大雪，在列车和池塘之间，排成一字形长队，用脸盆、水桶递水，灌进锅炉，生起炉火，以便继续前进。与此同时，郭惠申等到昆山县城，搞到了一些馒头，带回车站，供大家充饥。同学们还抓紧机会，向站台上的旅客宣传抗日救亡，表明

上海学生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决心。

这天上午，潘公展、马宗荣（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秘书，这次作为特派员，乘飞机专程来沪）等十余人赶到昆山站“劝说”学生返沪。马宗荣说什么“本人代表中央前来慰问”，对学生请愿意见，“政府原已全部接受”。他还说蒋介石准备在最近召集上海各大学校长和学生代表开会，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先提出，带回去呈报教育部长和行政院长。同济学生代表严正提出：只要政府抗日，学生愿做后盾，学生赴京请愿就是为了要求政府反对“华北自治”；维护领土完整；惩办压迫学生运动的份子；抚恤华北受伤同学；讨伐汉奸殷汝耕等。潘公展这个平时神气活现的党棍，今天却竭力装扮出愁眉苦脸。他为了贯彻蒋介石关于决不让学生赴京请愿的命令，以便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两眼流泪，双膝下跪，表示愿意把学生的要求全部呈报国民党中央，“恳求”学生切勿赴京。同时，他还暗中收买特务学生，偷偷地说，谁能使请愿学生回校，就给他一个社会局的科长职务。混在请愿队伍中的一些特务学生，就加紧了分化瓦解的勾当。敌我双方一直僵持了好几个小时。

下午四点钟，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带着秘书长和高职、附中的主任等二十余人赶到昆山“劝说”。混在请愿队伍中的特务学生又乘机散布流言。当时高职的多数同学身无分文，又不肯吃潘公展送的面包。面对僵持的局面，逐渐产生了如果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到此为止的思想。高职学生代表便与大学部的有关人员商量，一起召开“十人团”团长会议。在会上，少数人主张继续前进。多数人认为，由于大家仓促出校，至今饥寒交迫，极度疲劳，而请愿活动对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方面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昆山站前面很长一段距离的路轨已被拆走，一时难以修复。最后，通过了先回学校的决议。于是，由同济学生代表在昆山车站向上海各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明同济学生赴京请愿之目的和意义，并要求各报登载，以扩大抗日救亡的影响。

这次上海学生请愿队伍，虽然没有到达南京，但宣传群众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国民党的重要交通动脉京沪线（今沪宁线）瘫痪了一段时间，大大震撼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上海、江浙一带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广大学生也从中受到极大的锻炼和教育。

# 一二九运动在大夏

余 昕 郭 敏

袁德齐 向 枫

## 去 江 湾 请 愿

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上海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十二月十九日晚饭后，暨南大学的同学来喊：“我们要收复失地！”“我们去请愿！”我们大夏的不少同学积极响应，涌出校门，加入了请愿的队伍。当队伍走到交通大学时已经熄灯，一路上沿途又联络了许多大学的同学，其中光华大学也参加了。整个队伍四人一排，浩浩荡荡地行进在漆黑的马路上。黎明时，队伍汇集在江湾国民党上海市府门口，只见许许多多的请愿同学，不顾路途疲惫，纷纷向上海市国民党当局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虽然这次请愿行动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影响很大，震动了整个上海，这是国民党所料想不到的。各界派人送来慰问食品，中学生第二天也开始成群结队，一批又一批向江湾进发，使得上海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十分被动。这次行动后，几个人学的同学组织了上海大学联，领导大学生的爱国运动。

## 大夏大学的党支部

上海的大夏大学和暨南大学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分别建立中共支部。一九三七年刘晓到上海重建江苏省委后，我们的支部才被正式承认。大夏大学党支部建立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二九运动前，从北平转学到大夏的一位同学叫黄尔尊，他很活跃，是CY，余昕与陈训涛问黄尔尊：“你是否知道共产党？”黄不表态，只说他也想找党。以后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党，组织上把化名“老张”的陈家康介绍给我们。一九三六年初，余昕与李训涛先入党，寒假后，刘开基入党。四月，三个党员在陈家康的领导下建立了支部，推余昕任支书。一九三七年张英（黄文荃）、郭敏（原名丘淑燕）、袁德齐等人入党。那时，还有些党员如杜心源、徐锋（又名徐剑吾）的组织关系不在大夏支部。一九三四年前，大夏大学的党员还有马一行。一九三七年上半

年以前，大夏大学党支部由陈家康联系，下半年改由老吴（日本留学生）联系。大夏大学的学生运动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的。

### 在宣传中团结群众

当时，大夏大学的救亡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举办讲座，内容有“日本问题”、“国际问题”以及“社会发展史”等，有时还配合挂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二是组织各种学会，其中以“史地学会”影响最大，还编过一本《史地知识》的刊物，由吴德让主编，得到史地教授梁园东和王成祖的支持。三是组织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和团体，如歌咏活动，先是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又专门成立“大夏歌咏队”。第一次活动是请灌制《夜半歌声》唱片的盛家伦来校作表演唱，第二次活动是请吕驥和安娥作有关歌唱知识的介绍，以后又请音乐家教唱《枪口对外》，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四是“读书会”，由向枫等人组织起来的，基本成员有吴元成、周泽芬、郭敏、项淑贞（向枫）、袁德齐等五人。为了便于联系，郭敏把长得高的向枫叫“大号”，把年龄最小的袁德齐叫“五号”，然后由五个同学去发现思想好的同学，加强联系，扩大读书会的范围，逐步使读书会以寝室为单位开展活动。五是演戏，我们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秋瑾》等戏剧。除此之外，还组织同学学习世界语、观看苏联电影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好方法，使救亡运动更具有广泛性。

### 救国会、光明社及五月社

一九三六年主要搞救国会活动，救国会在大夏大学有两条线：男同学是学生救国会，由余昕、张英、陈训涛负责联系；女同学是妇女救国会，由向枫负责联系。救国会不但在学生中开展活动，而且还把门卫×××、校工卢保富、油印工王文义以及护士林淑仁都发展进来，以后这些同志不但都支持我们搞学运而且有的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我们曾将卢保富介绍给南京救国会孙晓村做“传达”，后来他参加了新四军，一九四〇年前后他牺牲前曾任中共镇江县委书记。

在校女同学还成立光明社，发起人向枫，积极参加的有袁德齐、

郭敏、杨汇川、吴元成。歌唱家盛家伦曾为光明社创作了一首《光明社歌》，意思是我们妇女为了追求未来的光明，应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来。光明社出版了《晨钟》墙报，还请孙兰、王汝琪等来校作报告，讲“妇女问题”、“娜拉出走”等，推动妇女进步，争取独立平等。同时还搞了歌咏队、口琴队、活报剧等，宣传抗日，扩大影响，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八·一三”抗战爆发。

五月社是向枫在校外和原高中同学一起组织成立的，它和光明社一样，都是党的外围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原高中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国。社中成员陈其襄在生活书店工作，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救国时报》和其它一些进步书刊，向枫也将《救国时报》等书刊分发给校内进步同学阅读。五月社还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同学联系，为他们邮寄《大众生活》、《救国时报》、《救亡日报》等报刊，这些学生有清华大学的徐贤议，山东大学的赵瑞霖，杭州医专的吴性慧，温州的洪彦霖、胡景城、林爱雪等。

### 几次重大的纪念活动

面临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上海救国会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救亡活动，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团结御侮，大夏大学的同学都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一九三六年“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的队伍刚跨进租界时，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军警向我们队伍冲来，袁德齐气愤极了，义正词严地责问“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阻止我们游行？”同学们不顾巡捕的警棍在头上飞舞，搀扶被打倒在地、手拿红旗的女工，冲向前去。

“三八”纪念活动中，韩学章带领大家一起集会游行。这次活动以妇女为主，各界都参加了，大夏的同学担任纠察。

九一八纪念活动中，我们先在南市小东门一带集合，规模很大，但遭敌人破坏，游行队伍被冲散，田冲被捕，押上路旁的黑色汽车。大夏许多同学英勇地与帝国主义巡捕搏斗，郭敏、袁德齐等冲向马路中心散发传单。史良在这次活动中也受伤，《妇女生活》作了报道。通过上述纪念活动使同学们经受了锻炼，同时也懂得了要讲究斗争方式。

## 声援复旦大学的打钟事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复旦大学七名同学被捕，称为“三二五事件”。上海各界为之声援，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暨南、大夏、税专等学校的同学在大夏大学集合，准备去复旦声援。当时，地下党安排邹志道去教室大楼（现华东师大文史楼）楼顶敲钟，由田馨田（现名田冲）掩护，以此号召同学们集合后前往复旦。敲钟后，邹志道被殴打，顿时一片混乱，大夏大学的特务头目卫鼎新和爪牙钟焕新、谢希等大打出手，不少同学被打伤。但同学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这次事件后大家仍积极地投入各项抗日活动中去。

### 各方配合，联合救亡

大夏大学当时开展活动，与兄弟学校都有着联系。如袁德齐与光华大学的张持平联系；郭敏与暨南大学的缪淑华联系；向枫与妇教的杜君慧、罗琼、王汝琪、姜平（即孙兰）联系。除此之外，我们还与同济的负责人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朱××、中学联的汪德芬等人都有联系。八一三以后，我们还派郭敏、向枫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使大夏大学的活动面更广泛了。

八一三后，我们有不少同学被分配到法租界的难民收容所去工作，组织难民搞墙报和口头宣传。每天清晨，张英先带大家做操，然后同学们分工去活动。

### 参加训练班，提高战斗水平

八一三后，江苏省委举办过党员训练班上党课。分二批：第一批是支部书记干部，余昕和暨大陈伟达都参加过。第二批是张英、郭敏、袁德齐等五人参加。我们事先约好地点，每人手里拿一样东西做暗号。党课内容丰富，有党纲党章、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白区工作的方式方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等。当时组织上叫我们轻装，准备通过游击训练班到敌后打游击。这课是张爱萍讲的。后来因找不着地方就没有再举办。

由于日寇大举进攻，地下党要我们组织广大同学去内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我们就带领了大夏和暨南不少同学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去。（秦建君、柳淑卿、刘璣章、郝喜兰一九八一年四月访问整理）

# 一二九运动在暨大

陈伟达

一二九运动以前，上海暨南大学除了中共支部以外，还有共青团、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后来“左联”解散、成立抗日救国青年团，由黎莹、胡夏青、刘慈恺、邝劲志等同志负责。1936年初的中共暨南大学支部由黎莹任支书，胡夏青等任委员。但是我们上一级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主要是从第三国际的七大文件和我党《八一宣言》中得到启发，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此为中心发展工作。

暨南大学的近邻是大夏大学，该校中共支部也是幸存下来的一个。我们共同配合作战，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种合作尤为可贵。大夏大学的支部书记余昕（现上海机电二局党委书记），人称其“大鼻子”，还有“大个子”曹鲁，“大眼睛”聂鲁达，这三个“大”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都是大夏大学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我在三七年初的前后，先后与田心（田冲）、刘开基、王文荃（张英）均有联系。在1937年3月刘晓同志来上海后，王文荃担任了学生界的党团书记，我与另一位同学是委员。

一二九以后北平派黄敬来沪联络。当时上海已经没有统一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从上海的实际出发，不另搞“民先”，而是通过“救国会”形式来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界是运动的先锋。暨南大学在上海学生运动中也是骨干之一，我正式加入党的组织是在1937年2月，但在这以前，我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我们已经秘密的积极准备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则提出“以行动取消行动”的口号，并由暨南大学的复兴社发起，由一个广东人潘××的军事教官任指挥，由复兴社的学生出面组织。去江湾“请愿”。面对现实，我们反复研究，来一个“将计就计”，我们不出面组织，让国民党去出面搞。当游行队伍从暨南大学到大夏大学时，他们已无法控制整个局势

了，救亡的激情无法压抑！队伍到达江湾后，他们又妄图把队伍拉到复旦大学“休息”，以此缩小影响，其实点燃的熊熊烈火，想扑灭也是徒然，到这时候开展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逐步由我们承担，沿着我们党的轨道前进。

暨南大学不仅在学生界是比较活跃，在妇女界也很活跃，如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胡夏青是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正式成立后，暨南大学左涌芬、陆惠年等同志是理事会的理事。至于暨南大学的进步教授郑振铎、钱亦石、胡愈之、周谷城、周予同、张栗原都参加文化界等方面组织的救国会活动，影响很大。

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学生南下，我们发动学生北上，以此呼应，这就是闻名于世的1935年12月23日开始的上海学生晋京请愿的大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冲进北站，强行登上火车去南京请愿，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去了。一路上敌人设置重重障碍，沿路我们还下河捞被敌人拆去的铁轨，寒风刺骨，饥寒交迫，倍受艰辛。但是同学们情绪激奋，甚至由我们学生自己驾驶着列车向前行进。最后迫于敌我均势之悬殊，虽然请愿学生被反动军警从无锡押送回到上海，但同学们得到了锻炼。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把点燃的救亡烈火从宁沪线顺着铁路燃遍全国。

晋京请愿后，学校当局放出空气意欲加害于我们，从此把救亡运动压制下去。当时我们针锋相对，康乃尔、刘烈人、胡夏青、邝劲志和我，共同商讨成立暨南大学的救国会组织，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没有多久，在学校后面的一个私人花园内，正式成立救国会。党支部通过救国会组织，团结更多的同学，为抗日救亡而共同战斗。然而学校当局并不罢休，于1936年暑假，竟然下令开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康乃尔、刘烈人、张馥、刘慧恺等十名爱国同学。以后在这些同学中，有的转学北上，有的转学到其它地方，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没有被开除的李冰洁、邝劲志、李应芬和我等同学，仍在暨南大学坚持斗争。

当时上海的救国会运动，在宋庆龄、马相伯以及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组织下，救亡活动搞得蓬蓬勃勃，我们暨南大学的同学也是积



极参加的一分子。如1936年下半年期间，上海组织了一次在黄浦江畔大唱《五月的鲜花》的活动，由刘良模指挥，边唱边呼口号：“枪口对外！”“不做亡国奴！”。这次活动很成功，歌声不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不少军警也被触动得泪水直淌，因为谁都不愿当亡国奴！

1936年的“五卅”纪念活动，先在苏州河边的市商会礼堂举行纪念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等参加了，沈钧儒还带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有的口号似乎偏激一些，但这是“四·一二”以后第一次冲破白色恐怖，意义还是深远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开始大家都主张杀蒋介石，后来在党的引导下，认识和平解决对抗日大局的重大意义，防止了盲目冒险的行动。1936年下半年南市的一次活动，张登（沙文汉）任总指挥，我任总交通，由于安排上的疏忽，竟把我们自己的指挥部设在南市警察局对面，这是非常不利的。活动尚未展开，我们的游行队伍只得突围，进入法租界，队伍很快被打散。

1936年春节期间，我们组织同学去曹家渡深入劳动人民之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听众多数是人力车工人和码头工人。我们暨南大学的学生一宣传，围观的听众越聚越多，警察前来干涉而引起冲突，刘慈恺等三同学被捕。同学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冲进曹家渡警察局。切断电话线，阻止外援，救出被捕的三位同学，把警察局长涌出来游行，群众竟达二万人。史良等爱国领袖前来慰问，外国记者还专门作了报导，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由于过分地公开进行活动，暴露了我们的力量。

关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我记得在鲁迅逝世前，在沪江大学（现上海机械学院的旧址）正式成立全国学联，暨南大学有三个代表出席：邝劲志、李××和我。会议选出北京地区为主席，北京代表是段君毅，我是执委。全国学联对外公开是鲁迅出殡时以学联名义发了宣言，正式宣布成立。至于鲁迅葬礼一事，是地下党通过救国会组织的一次群众性的抗日大示威，国民党反动派也早有预感，狡猾地规定这一天是考试日子，妄图把学生关在学校内。我们私下商定，只考到六十分的及格成绩，便冲出校门，加入万人送葬的行列，反动当局的计谋失算了，我们取得了胜利。

在斗争中我得到了锻炼，于是在1937年初，我和李冰洁、邝劲志三同学由黎莹、胡夏青介绍入党。同年夏天，江苏省委组织大学支部书记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复旦大学、大同大学、交通大学、政法学院、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那时我是以暨南大学的支书参加了训练班，记得大夏大学的支书是余昕，他也参加了。训练班主要内容：①由省委军事部长张爱萍讲游击战，分几次讲毕；②由刘晓同志讲统一战线等等。总共搞了十多天，这对帮助基层支部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1937年江苏省委成立后，工作的中心是整顿组织，发展组织，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时党安排我去教会学校开展工作。如到圣约翰大学、麦伦中学，深入基层，帮助他们建立支部。马一行同志那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并在清心中学兼职教书，我们通过他，开辟了“清心中学”的阵地。“八·一三”后，绝大多数的大学、中学的党支部都已相继建立，这对组织今后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抗日救亡中，暨南大学又参加了援绥活动，主要是捐款做了五百件棉背心，送给绥远抗战的将士；以后的难民营工作，各单位都派代表去工作。总负责是周克、诸敏（周克的弟弟），暨南大学的学生也积极做这方面的工作。总之，自一二·九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后，暨南大学的学生不顾白色恐怖，积极参加，我们的行动还得到许多进步教授，如郑振铎（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钱亦石（讲世界史的）、胡愈之（讲世界语的）周谷城（讲南洋概况的）张栗原（讲教育学的）以及周予同的大力支持。

（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题目由整理者所加。1981年4月访问。  
访问人刘嫩率、柳淑卿、秦建君。整理人：秦建君）

# 不灭的火焰

——记一二九运动后大同大学及其附中学生的斗争

王槐昌 柯青

在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中，当时座落在南市南车站路上的大同大学及其附中学生积极投入了这股抗日爱国洪流。他们于19日晚参加了在交通大学举行的抗议集会；第二天凌晨与各校一起到达江湾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另一支学生队伍又来到本校附近的江西高级职工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清心男中、清心女中等中学，呼吁同学一齐行动，汇集了约二千人在南市宣传游行。大同附中的许多学生还参加了“上海市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北站慰问和鼓励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坚持斗争；组织宣传队，分组到南市中华路、老西门一带，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侯德齐、程淡志（李光）、周嘉鹏、吴学毅等同学还奔赴南翔参加“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救国宣传团”，到嘉定、昆山、苏州等铁路沿线县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

一二九运动后，大同学生的斗争犹如不灭的火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熊熊燃烧。

## 不畏强暴的时事研究会

1936年4月15日，上海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民族危机已到了再也不能退后一步，号召中学生参加到广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阵线中去。大同学生立即响应。5月20日由郑英华、邹强、程淡志（李光）、马守一、侯德齐、周嘉鹏、朱凤熙等60多位同学组成了时事研究会性质的救亡团体——“日本研究会”。以这种形式，继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进一步唤起同学的抗日爱国的热情。在当时条件下，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也非易事，当他们于晚上在教室开干事会时，一些特务学生在窗外用石子投击，进行谩骂，并把研究会出版的墙报、简报偷掉、撕毁，但大同的爱国学生不顾这一小撮

人的破坏，毅然冲破阻力，仍坚持出版壁报，宣传抗日救亡，刊物多达一、二十种。后来，周嘉鹏、朱凤熙、吴学毅、孙少礼等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

同学们以时事研究会名义，开展多种活动，有时举行时事讨论会，分析当时形势，揭露日帝侵略和国民党卖国的罪行；有时请社会知名人士曹聚仁、章乃之、徐懋庸、刘良模来校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提出见解，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介绍西北地区情况，了解抗日运动的趋势；有时组织学生到校外听讲，提高学生的认识，受到学生的欢迎。

时事研究会的活动，引起特务学生的注意，受到反动军警的破坏。大同进步学生郑英华（郑挺）于1935年秋天在校外被捕，被监禁在蓬莱路市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才被释放，但行动仍极不自由，每隔几天公安局内的一名特务要指定地点找他“谈话”，以后又常派“包打听”监视他，但他没有屈服，仍机智地参加进步活动，后被选为大同时事研究会干事，曾主持一次时事讨论会，特务就在6月17日将他逮捕，先关在蓬莱路市公安局内，后押送到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1936年6月28日《救亡情报》曾以《大同大学学生失踪》为题，报导了郑英华被捕的经过，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郑英华被捕后英勇、坚定、毫不屈服，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判罪，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郑英华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到福建参加抗日工作，曾任中共福州市工委书记，闽江特委书记。1941年在福建崇安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 为影片《青年进行曲》配唱的大同歌咏队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大同学生成立了歌咏队，开始有四五十人，后增加到八十多人，参加者有邹蓉、程淡志、侯德齐、周嘉鹏，朱凤熙、庄寄弘、丁佩瑜（丁瑜）、秦镇球、高颀秀、吴学毅、张慧珠（张汎）、孙幼礼、吴学芬等人，聘请盛家伦先生来校教唱，也曾经邀请冼星海来救唱进步救亡歌曲，如《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保卫马德里》等等。同学们齐声高唱：“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向，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鼓舞了学生抗日救亡的热情。

1936年拍摄的影片《青年进行曲》，其主题歌《青年进行曲》系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摄制者特地邀请大同歌咏队配唱，由冼星海同志亲自指挥。歌中唱道：

“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我们要以一当十，以百当千，我们没有退后，只有向前向前！兴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嘿！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全歌充满着激昂、勇敢、坚毅的气势。歌声极大地鼓舞了青年抗日救亡的斗志。

### 和工农群众并肩战斗

大同学生还利用星期日和假日到附近农村和工厂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6年上半年，程淡志和吴学毅两同学步行30里到闵行一个小学去，联系好借用礼堂演出等事宜，随后参加演出的同学出发到达目的地，住宿在一个破庙的稻草堆里，第二天即为附近农民演出抗日救亡的宣传剧，演唱救亡歌曲，受到农民的欢迎。

同年暑假，程淡志、吴学毅和校友郁钟正（即于光远，在清华大学读书）经常到浦东区宣传抗日，教当地的工人和孩子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结识了不少工人子弟。有一次，浦东的警察不准学生宣传队演《放下你的鞭子》，吴学毅和程淡志就登台说：“当局不让演抗日的戏，我们来唱歌吧。”当场就指挥群众唱《打倒日本》、《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一首连一首地唱了起来。面对情绪激昂的群众，反动警察束手无策。天黑了，同学们在工人群众的护送下，手挽着手唱救亡歌曲，高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登上渡船返回上海。这次活动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

同年9月17日傍晚，为了纪念“九·一八”，大同女学生宣传队丁佩瑜（丁瑜）、高擢秀、张慧珠（张玗）、孙幼礼、吴学毅、吴学芬等在陆家浜路向乘凉的工人宣传，唱抗日小调，散发传单。警察跑来干涉，不准宣传。女同学们毫无惧色，在工人支持下继续演讲和演出。最后，反动警察下了毒手，竟抓走了五个女同学，带到陆家浜派

出所，没收了抗日宣传品，搜查了书包，还恬不知耻地责问同学：“谁叫你们来宣传的？”同学们沉着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自己来的”。使警察哑口无言。在这些女学生的斗争下，警察毫无办法，只得让她们写了假校名、假姓名后回家。

### 形式多样的读书会活动

1936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力量加紧迫害，大同大学和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学生在暑假中被开除了一百多位爱国学生的学籍。反动派的迫害并没有吓倒广大学生，大同同学转面用更合法的形式继续加强团结，宣传抗日。他们以同乡会、理科会等名义开展活动，组织了读书会。马守一在学生宿舍里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大家收集一些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编的《新经济学大纲》，《新生》杂志以及进步文艺小说等等。参加活动的有邹强，程淡志，胡学恕、马肇嵩、丁佩瑜、徐国定、周嘉鹏等。他们有时开讨论会，有时去看《今日的苏联》、《夏伯阳》等苏联电影；有时组织秋游活动，目的是联络感情，加强团结，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他们发动同学参加鲁迅葬礼，又请徐懋庸先生来校作报告，介绍鲁迅先生的事迹，了解鲁迅的伟大生平。

吴学毅、高振秀、张慧珠（张巩）等同学组织了“女同学课余读书会”，出版墙报。校方下令解散组织，不准她们活动，但她们在没有组织名义情况下，继续开展活动，学习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讨论时事问题，认清抗日救亡的形势。

1936年11月，绥远军民击败日伪军联合进攻，收复了百灵庙，为此全国人民开展“绥远运动”，上海学生纷纷响应。大同学生邹强、程淡志、马守一，周嘉鹏等人研究后发出公告，要求同学为援助绥远抗战进行募捐。大同篮球队与圣约翰篮球队举行球赛，把门票收入用作援绥。并由安徽、广东、福建同乡会名义共同发起公演话剧；请崔嵬先生来校导演《放下你的鞭子》，请丁里先生来校客串“老头”，又演出《最后一课》，还请唐纳先生来导演英文剧《皇子与乞丐》，这些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激励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援助绥远抗战作出了贡献。

# 爱国女中的抗日爱国活动

贾唯英

1934年秋，我进爱国女中读书，当时校内尚看不出有什么进步活动。1935年春胡文新同志转来我校后，学生的爱国活动才逐步开展起来。

胡文新和我同班、同座位。1935年8月她介绍我参加了爱国女中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社联小组”（“社会科学者联盟”的简称），同组有高三的周桂芳、黄佃佃，初中的包鹁子等约五、六人。胡文新是小组领导人。“社联”小组实际上成为领导全校学运的核心组织。

## 声援一二九运动

北平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社联”小组立即开会讨论如何发动同学开展声援活动，决定：1、在同学中广泛宣传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和意义；2、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讨论如何声援北平同学问题；3、派出代表与各大中学取得联系。经过大家分头进行工作，大约在12月15日左右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并成立了“爱国女中学生救国会”，选出了执委。我任主席，胡文新任副主席，并由胡文新代表学校救国会进行对外活动。12月17日我们派代表参加了在正风中学召开的全市中学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市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爱国女中当选为执委。18日中学联代表上海八十多所中学发表了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运动。12月19日复旦学生发起向市府请愿，我们得到通知，动员同学作好参加的准备。20日清晨5点多钟，“中学联”请愿队伍高呼着“欢迎爱国女中同学参加请愿”的口号来到我校门口，我校三百多同学一涌而出，参加了这支几千人的中学生请愿行列。冒雨步行到江湾市府。这时，先行到达的近万大学生请愿队伍，在迫使市长吴铁城在请愿书上签字后，已整队赴市区游行。我们这几千中学生又把市府包围，要求吴铁城出见。但市府大门紧闭，无人

理睬，只有一些职员从窗口里探头观看。这就把同学们激怒了，许多同学拣起石子向市府玻璃窗掷去。这时，不知是谁突然喊道：“同学们！政府不答复我们的要求，要抗日救国的就跪下”。有的人一时弄不清怎么回事，真的下跪了。下跪岂能感动那些铁心卖国的老爷们。一个“中学联”的同学立即大声叫喊：“我们不能下跪！我们要起来斗争，团结民众，奋起抗战”。下跪的同学都站了起来，一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迫使教育局长潘公展不得不出面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答复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正准备出发到市区游行，突然开来了许多公共汽车，下车的是奉命前来的各校校长、训导主任，还运来了面包、点心，他们分散到本校同学中进行活动，劝阻同学到市区游行：“你们饿了，学校已为你们运来了面包”“你们累了，学校备有公共汽车接你们回去”。有的软硬兼施威胁同学说：“游行是共产党搞的阴谋，出了事，学校不负责”等等。爱国女中的训育主任走到我和李秀若跟前强装笑脸说“同学们，辛苦了！校长特派鄙人为大家送来面包，备了车子接大家回去，早点休息”。大多数同学不为所动，李秀若带着同学一起喊道：“我们不回去，不坐你的车子，我们不吃你的面包”，尽管大家又饿又累，但仍坚持步行至市区参加游行。

### “一二·二四”大示威

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市大中学生晋京请愿团出发时，“中学联”通知我们发动同学参加12月24日全市大中学生、工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通知规定：各校分散到南京路附近等待，听到鞭炮声就自动集合起来。那天，我校几十个同学很早来到了南京路，佯作在商店东张西望，观看商品，突然从先施公司（今上海服装商店）屋顶花园上响起了鞭炮声，随着而来的是震天动地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传单雪片似的从屋顶飘下，我们立即跑步到街中心。只见群众从大街小巷，四面八方，飞奔过来。虽然大家互不相识，却象亲人一样，手挽手，肩并肩，四人一排，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涌向南京路。游行队伍突遭一群英国巡捕的袭击，经过搏斗，队伍又重新集合起来前进。这次参加游行的群众真多，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一路上



又有许多群众参加进来，行进到东方图书馆旧址参加了市民大会，会后又继续游行。抵达外白渡桥时，印度巡捕排列桥头，不准通过。“为什么不准我们进入自己的土地？”群众气愤极了。多少还有点天真的女同学原以为巡捕对“女士们”会客气些，就带头向桥上冲去。想不到手持“哭丧棒”的印度巡捕却不分男女，劈头盖脑地打下来。冲上去，被打下来，再冲上去，又打下来，如此反复数次，有的同学头部被打伤，有的被击倒在地。为了避免损失，游行指挥部临时下达了解散的命令。大家只好抑制着心头的仇恨，结束了这次游行。

国民党政府为了扑灭学运，分散群众，于12月25日宣布提前放寒假。就在这个寒假中，胡文新又介绍我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仍由胡领导我们。王瀚和胡乔木同志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36年春开学，胡文新转到惠平中学去了。开头几个月她仍然领导我们，到5月才由复旦大学的程天赋同我联系，6月蒋南翔同志也来联系过，还有一个姓陈的四川人也同我联系过，名字记不得了。36年上半年“抗日救国青年团”吸收了一些新成员，李秀若也参加了进来。

## 一·二八纪念大会

一九三六年“一·二八”当天，我们动员本校同学去参加“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发起。沈钧儒老先生亲自领着几千人（多数是青年学生），从北四川路集合出发，步行到庙行“无名英雄墓”前举行纪念会。在悲痛激昂的“一·二八”纪念歌声中，开始祭忠魂，主祭人沉痛朗读祭文：“上海各界民众今以至诚致祭于无名英雄之墓，我们今后愿牺牲我们的生命、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并联合全国民众去完成民族解放的伟业，以报答诸先烈的牺牲……”然后由各界代表献花圈和讲话。大家在讲话中都指出，由于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已失，华北又将不保，“一·二八”事件还可能重演。群众情绪十分悲愤，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全国民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群众中有人大喊“有特务开黑名单，捉特务，打特务！”原来有一个自称记者的中年人在偷写黑名单。一时喊打之声四起，群众抓住那个家伙痛打了一顿，要不是主席团一再劝阻，准会打死。最后，大家把他弄上一辆小

轿车，车窗上贴了“被群众痛打的汉奸特务”几个大字，车子缓缓跟着游行队伍回到上海市区。一路上群众围观这个被打的家伙，都说：“该打，打得好”。队伍到达英租界时，天色已黑。大批外国巡捕，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不准队伍进入租界。此时游行群众已十分疲惫，主席团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游行到此结束，取消去南京路游行的原议。记得当这个决定下传时，一部分群众不同意主席团决定，坚持要求到南京路游行，并表示“今晚把命拚了，把血流在南京路，也不解散”。还责备主席团的决定是软弱、胆小的表现。虽经主席团成员王造时亲向群众解释，也不济事。队伍闹闹嚷嚷，乱哄哄的。这时胡文新走来告诉我说，要求到南京路游行，是托派提的过“左”口号，要我向爱国女中同学和其他群众进行解释。经过许多人在队伍中做了解释工作，最后才说服了群众，宣布解散。

### 暑期抗日宣传团

1936年夏，市学联组织了一个上海大中学校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沪杭线进行宣传。我和一些同学都参加了。宣传的第一站是松江县，我们到达后立即分开活动：歌咏队在街头教唱抗日歌曲，话剧队与戏院交涉要求演出。晚上，正当演员在后台化妆准备演出时，松江县政府突然通知不许演出，争论很久，只准演出一个节目。正在演出中，剧场电灯骤然熄灭，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捣鬼。群众在剧场大喊大叫，纷纷质问“为何把电灯关了？”正在这时，松江县县长亲自出马通知宣传团负责人“立即离开松江县境”。大家气极了，同他争辩。不一会，开来一批军警和便衣特务，把宣传团包围起来，命令立刻上火车。这时我校李秀若同学挺身而出，站在台阶上，对聚集在周围的群众高声讲演：“同胞们、老乡们！我们快要亡国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东北，可是政府还不准我们宣传抗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国民党军警两人押一个团员，强行把我们拖上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大家情绪十分悲愤：有的忍不住痛哭起来，有的高喊口号，有的放声高唱抗日歌曲，有的低头沉思。沿途我们把带来的传单全部散发给了群众。暑期将结束时，我和李秀若离开上海，转学到了北平，开始了新的战斗。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学生运动片断

胡实声

一九三五年，我在税务专科学校读书时，由中学的同学杨成祺（又名杨立钧）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以下简称武自会）。武自会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我校的学生运动就是由武自会领导的。

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积极响应。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上海学生界第一次大游行，这天下午四、五点钟，队伍先在交大集合，晚上九点，队伍从交大出发沿着中山路徒步一昼夜走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在游行过程中，国民党当局抓了两个交大同学，群众很气愤。到了江湾，在同学们强烈要求之下，国民党市长吴铁城不得不出来冠冕堂皇地讲了几句，也不得不把被捕的两个学生放了出来。大家见此情形，以为斗争已经“胜利”，游行便告结束。第二天，中学生也去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请愿。

通过这次游行，同学们体会到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需要建立统一的学生组织。一九三六年一月间，上海市大专院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即上海学联）成立了。学联第一次会议是在税专召开的，与会者有复旦、大同、暨南、同济、美专、中法工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代表，推税专当主席，几个有名的大学当理事，成立了理事会。当时，几乎所有大学的学生会多数在国民党控制之下，交大只有少数进步学生参加学联，所以参加学联的学校不是代表学校的全部学生而只是代表部分进步学生。学联对进步同学来讲是公开的，对反动派来讲还是秘密的。共青团、武自会、左联、社联等在各校的基层组织都通过学联沟通关系。大家虽不是统一的领导，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一致的。

成立全国学联时，清华大学孙兰（原名韦毓梅）等来上海，他们到税专宿舍（在永乐新村）与我联系。上海学联派彭瑞复参加筹备全国学联的工作，筹备会议在无锡进行。成立大会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场召开的。

在寒假中，上海各大、中学组织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沿京沪线（即今沪宁线）下农村宣传。这是学联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下乡之前，武自会负责人找我们在八仙桥的一个小旅馆里谈了一夜，布置了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七、八个学校的学生到了南翔，在一所中学里集合，约八、九十人。复旦人数最多，为第一中队；大夏等几个学校为第二中队；税专、美专、蒙藏专科学校等为第三中队。三个中队下设九个小队，每个小队设小队队长、交通员、先遣队、宣传员、组织、救护、事务等工作人员。

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三、四点钟光景，同学们怀着炽热的心，从南翔起程向农村进发，沿着公路走，经过村落小镇，便停下来站在街心向过路的群众进行演讲。同学们有的跑进茶馆同茶客们“闲谈”；有的分发图书宣传品；有的拉住七、八个儿童教他们唱救亡歌曲。

当天，抵达嘉定县城，住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家排了队伍，举着大幅图画、旗帜，高呼口号，唱着歌曲，绕城游行一圈，轰动了正在预备过年的嘉定人民。

接着，队伍便向太仓前进，途中帮助当地农民组织一个农民救国会。在太仓，上午整队游行，下午分队宣传。同学们还向当地官商进行募捐，一天竟捐得近百元。在太仓的第二天，同学们冒着雨雪，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曲，继续前进。

下午两点，队伍到了昆山，在热闹的街市又游行一圈，这天正巧是旧历新年，给昆山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大家到昆山中学休息时，国民党县公安局便派了督察长来威吓，昆山中学校长也来“盘问”。面对这种情况，同学们斗志更加激昂，一致主张到公安局去示威，勒令公安局长拿出诬蔑“学生受共产党利用”的所谓证据，并要求组织民众法庭，审判破坏爱国运动的汉奸。这时，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妇女界救国会，也派了代表前来慰问，更增添了大家的力量。同学们在当地组织了昆山民众救国会；晚上，在民众娱乐场演出了爱国新剧，发表了演讲。一月二十六日当队伍离开昆山时，昆山的县长、公安局长又前来阻拦，大家就用歌声“回敬”他们。当地的保安队中有的士兵也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后来竟自动地高呼“欢送上海爱国学生”的口号。

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队伍到达了苏州，苏州城门紧闭着。交大同学许锡瓚、徐昌裕和钱保功等爬上城墙，打开城门，队伍涌进苏州城里，一边游行一边演讲宣传。苏州人民买了面包点心给同学们吃。学生的队伍与苏州市民汇合起来共约二千余人向国民党县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县长慑于群众的声势被迫出来与学生见面，但他矢口否认“紧闭城门”。大家怒不可遏，当众揭穿他的谎话，他窘态毕露，灰溜溜地躲进县府。我们继续宣传游行。这时，国民党苏州县政府派人来“招待”学生，要同学们住进学校学生宿舍。大家一则精疲力竭，二则以为苏州的宣传很成功，麻痹大意起来，同意住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八个人住一间，被“化整为零”了。第二天拂晓，大家正在梦乡中，大批宪兵（不佩戴符号）包围了学生，两个宪兵挟持一个学生，把学生硬押到车站，关在候车室里。在反动派武力威胁下，全体同学终于被强制押回上海。列车到了真如，根据《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士兵不能开进上海，宪兵只得退走，另换保安队押送。同学们在北站下了火车，重新整队在宝山路向上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

（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 秦建君、郝喜兰一九八〇年四月访问整理）

# 请愿目睹记

卢栋华

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大中学生晋京请愿。那时，我在闸北天通庵路建国中学读书，出于爱国热情，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上海建国中学晋京请愿团”。

## “欢迎小同学”

二十三日上午，我随请愿团到达北站，在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和刺刀组成的夹道中进入月台。站台旁停着十几节车厢，窗口伸出标明各个校名的白色横幅。当我们列队清点人数时，车厢里的学生高呼“欢迎建国中学同学参加晋京请愿！”这时，我校的训育主任忽然出现了，他说：“你们几个年纪太小不能去！”于是，凡被他认为年纪小的，都给叫了出来，我是其中之一。当我们被他带着向站外走去时，我趁他不注意，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快速跑回火车最后一节，但车厢铁扶梯下没有站台，离地太高，人小爬不上去。此时，站在车门口的复旦同学，高兴地喊着：“欢迎小同学！”一把一个将我们两人提了上去。就这样，我得以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请愿斗争。

## 卧轨接轨

由于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火车老是停着不动，学生派代表向路局交涉，久久没有回音。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女大学生忍不住喊着：“南京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身为中国人不能到南京去！”言罢痛哭不已，泪流满面，仰倒在旁。激昂、愤怒的气氛充满各节车厢。

等呀等，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火车才一声长鸣，缓缓移动，刚开过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就停了下来。田野一片漆黑，大雪纷飞。一位担任联络的大学生向大家说：“火车司机跑了，但我们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誓死到达南京！……”又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传来消息说：“政府从南京派来火车头要把我们的火车拉回上海，希望同学志

愿卧轨，阻止火车开回上海。”于是许多同学纷纷走下车厢，躺在雪深盈尺的轨道上，阻止火车退回上海。

消息又传来：交大同学挺身而出，自愿开火车。大家欣喜若狂，不一回，只见头戴大盖帽，身穿铜扣蓝呢服的几位交大同学，在大家面前经过。一阵阵鼓掌声、欢呼声，“向交大同学致敬！”响彻车厢。火车终于又前进了，车速很慢很慢，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然又停下来了，一停又是没个底。大家询问：“为什么又停下来？”隔了好久，联络员跑来告诉大家说：“前面铁轨被拆除了，无法前进”。

请愿指挥部的同学在这朔风刺骨的天气里，脱掉衣服下河，把当局派人拆丢的铁轨扛上岸来。由于没有工具器材，不能接装，他们就冒着大雪到附近小站挨家挨户找到了几名铁路工人，请他们协助接轨，接轨前，联络员陪同几名铁路工人一节节车厢向全体请愿学生介绍，顿时，车厢里响起了“劳工神圣！”“向工人学习！”“向铁路工人致敬！”的口号声。

请愿指挥部为了安全起见，找到了一辆手扳巡道车。巡道车在前面侦察，火车在后随行。又继续前进了，可速度之慢是可想而知的。

从卧轨、接轨中，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深深感到：工人的力量，学生大哥哥们的力量真大啊！

### 苏州学生送温暖

经过很长时间，车抵苏州。古老的苏州城也怒吼了！这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也起来了，我们听到了“向上海同学致敬！”“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远远眺望，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在挥拳高呼，向火车站走来，准备与上海学生会师，但被密布的武装军警所阻。虽然沪苏学生被分隔着，但我们深深感到上海学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一切爱国人民支持的。

苏州的学生、市民得知我们已几天未吃东西，就捐献了大批精美的稻香村盒装糕点，冲破军警阻拦，派了代表送到火车上。几千名请愿学生居然每人都能分到两盒，我舍不得一下子全部吃掉，留下一盒存放起来，心里想，从上海到苏州就要这许多天时间，从苏州到南京又不知道要多少天。大家吃了苏州学生、市民送来的糕点，真是甜在嘴里，饱在肚里，暖在心里。

## 血洗中南大戏院

火车象蜗牛爬似的继续西进，慢吞吞地到了无锡郊外，突然车厢一阵强烈的震动，把我震出了座位。火车停了下来……。

原来南京方面派了数倍于请愿学生的宪兵，全副武装，看上去真象是一望无际的黄色蚁群。火车完全受阻了。请愿指挥部令全体同学下车，到无锡城去示威游行。

车站前横阻着铁栅栏，队伍越过栅栏，同军警又发生了冲突，一阵冲挤，把我腋下的一盒稻香村糕点不知挤到哪里去了。我鼓起勇气，跳上车站的一个水泥墩子，居高临下，指着对面的一个宪兵大声斥责说：“你也是中国人，难道甘心做亡国奴？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应该去打东洋人……。”大概他见我还是个孩子，或者是受到了良心责备，并没有太难为我，我和大家就冲过了车站。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在无锡城内的街道上行进，全体人马开进了当时无锡城最大的剧场中南大戏院里去休整。剧场里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我校同学坐在二楼阶梯上。指挥部同学上台告诉大家：决心继续进行交涉，要求到南京去。台下学生大声高呼：“没有火车，我们步行也要到南京！”“南京是中国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到自己的南京去！”

复旦的一位学生，当场编写了一首歌，我称它为《上海学生一二九请愿示威歌》歌词是：“打倒汉奸！打倒汉奸！打倒一切没有良心卖国的人！奋勇前进！奋勇前进！不怕任何牺牲。”

歌词、歌谱用幻灯打在银幕上，由这位无名“作曲家”亲自上台指挥教唱。我们歌声嘹亮，一遍又一遍唱着，很久才停下来。忽然电灯亮了，台上站着蒋介石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无锡县县长等人。教育部长带着皖北腔的官话，装着沉痛的样子，讲了一通学生要回学校好好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会处理等等。接着那个无锡县长，讲了些“安慰话”，并假惺惺地表示供给学生一些吃的。他们说完就离开了剧场。大家吃了一碗光面，在剧场里等呀等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

突然间有一位学生惊叫：“我们被包围了！”大家向窗外张望，看到了密集的武装军警重重叠叠把中南大戏院团团围住。蒋介石政府不准我们到南京，也不准全体学生都乘火车回上海，怕我们回去后，在



上海继续集中游行。除部分学生被押上火车外，他们又调动了大批汽车把我们按学校隔开，每一个学生由两个武装士兵押送，连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例外，枪口对着我，把我押上汽车，当晚强迫送回上海。

回校若干天后，我校训育主任把全体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训话”，说：“你们学生中有共产党，是共产党不要紧，青年人**有勇气但无处世经验**，一时误入歧途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到我这儿承认、讲明白，我以人格担保，政府当局不会难为你们，并确保你们的安全，而且加以保密，不把你们的身份公开出去……”。可是，全体学生用沉默来抗议，没有一个人到他那儿自首。

（上接第64页）

毅到了西安，见到了林伯渠和冯文彬。林伯渠认为全国学联在新形势下应该宣布解散，各地学生应在当地党领导下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指示段君毅马上回上海传达这一意见。于是，段君毅又回到上海，传达了林伯渠的意见，全国学联发表了一个宣布解散的通知。段君毅并在去南京，以及在经武汉、开封去延安的沿途，向各地学生会也直接传达了林伯渠的意见。从此以后，全国大批爱国学生在各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投身于抗战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出青春和力量。

# 回忆一二九时期上海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胡子婴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以后形成的，是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涨的一个起点。北平学生十二月九日、十六日两次爱国救亡的大示威，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各界爱国人士都迅速卷入了这个运动。学生们先后成立了北平学联、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其他阶层的人民则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从一二九运动开始，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波澜壮阔，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成为推动抗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之一。

我参加了这个运动。尤其是上海妇女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前后的许多活动和工作，我是直接参加的。因此，我有责任把这些史实纪录下来。

## 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

北平学生一二九示威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十二月十二日，上海的文化界首先发难，后来以被称为“七君子”等爱国人士为中心，在生活书店以“聚餐会”名义集会，由他们出面，并由章乃器起草了一个宣言，发动上海各界签名，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我是发动妇女界签名的组织者之一。签名后的名单由我直接交给沈钧儒。我和他原不相识，只好事先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在胜利饭店会见，我把名单交给他，并作了自我介绍。他想不到我会出来搞这些活动，有些吃惊，因为当时章乃器不愿我出来，我参加活动是瞒着他的。

北平学生十六日的流血，更激起了上海学生的爱国义愤。十二月十九日，复旦大学的学生首先示威，继之有暨南、大夏、光华、交大、两江女子师范等十五个大、中学校的学生八千余人，到江湾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市长吴铁城不敢出来接见，而学生们从十九

日到二十日两昼一夜，聚集不散。吴铁城先以逮捕相恐吓，继而于夜间熄灭路灯，企图使学生队伍于寒风冷雨中自行瓦解，但都不能得逞。最后，吴铁城不得不出来接见并假惺惺地表示接受学生的要求，这样学生们才回来了。

请愿时，学生们两昼一夜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觉。我们（主要是文化界和妇女界）一方面发动各界捐款，一方面串连了几个中学，其中麦伦中学的学生组织了一个自行车队，我们就买了许多面包要自行车队带上面包去慰问。这样把原来一部分没有参加的中学生也发动起来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复旦大学学生带头，到南京去请愿。他们占领了北火车站。国民党如临大敌，调来了大批军警包围了整个火车站，断绝了“界路”（上海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周围的交通，学生被包围在车站，进出不得。当时，为了支援上海学生的爱国义举，沈钧儒、胡愈之、章乃器等人经常在功德林餐馆聚餐，互通情报，得悉吴铁城表面上扬言要开车送学生到南京，暗地里却驱司机、拆路轨，阴谋镇压。对于国民党政府玩弄这两面手法，我们想及时去通知学生，但车站被包围得水泄不逮，我们没法进去。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请何香凝出来解决，当时她的威信很高。我到了她家，她因患心脏病正躺在床上。我对她说：“赴京请愿的学生正被军警包围在北站，一天没吃东西了，我怕他们饿坏了，想给他们送点吃的，但是进不去。”她听了，立即从病床上起来，给了我二百元钱，叫我去买面包，并且决定由她带着我亲自送去。

事也凑巧，这时国民党将官张发奎的夫人坐着小汽车来看望何香凝。我们约她也同去，坐着她的车，带着两卡车面包来到北站，到了“界路”下车。我对包围的军警说：“这位是何香凝老太太，她是来慰问学生的。”军警一听就把她放进去了，但把我和张发奎夫人拦在外面。这时，何香凝回过身来，一手一个，把我们二人也拉了进去，但是两卡车面包仍被国民党军警用枪支拦在外面，不让进去。这时，何香凝愤怒之极，大义凛然地对军警说：“你们拿着枪杀人成性。你们杀了多少人，可不能再杀我们的后代！我老了，你们要杀人，就向我开枪好了，一百枪也行，一千枪也行，但不许向青年们开一枪，他们

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决不许伤害他们一个人。”应该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多数国民党军警内心是同情的。听了何香凝慷慨激昂的话，有个小兵感动地说：“老太太，我们不敢！”何香凝对他们说：“要是你们长官命令你们开枪，你们敢不敢？”军警们听了，就让装载面包的两辆卡车也开进去了。

这时，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闻讯赶来，把我们接到路局的大楼里去。他很害怕何香凝和群众接触。想借此把她与学生分开。也就在此时，我听见车站内汽笛在叫，火车已经开动，我们来不及把国民党的阴谋告诉学生们。

###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成立

以一二九运动为启机，上海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风起云涌地发展了。一二九以前，上海的抗日民主运动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少中共党员和各界的群众团体都在秘密活动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由宋庆龄任会长，杨杏佛、章乃器等人参加。一九三三年六月，副会长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刺死，这个组织就完全转入地下。另一个组织叫“苏联之友”社，头面人物是孙科，各阶层人物都有参加。妇女界办了一个妇女生活杂志社，出版《妇女生活》杂志，主编人是沈兹九，给刊物写文章最多的是罗琼、杜君慧等。通过这个刊物，组织了许多妇女的读书会，如工人读书会、家庭妇女读书会、学生界读书会、文艺界读书会等。这些读书会以培培尔著、夏衍翻译的《妇人与社会》一书为教材（这本书曾刊载在《妇女生活》上，刊物还发表过一些有关辅导材料）。这在当时来说，不仅对妇女界参加抗日民主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也帮助妇女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想。我当时在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教书，通过夜校与女工有比较广泛的接触。我自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就与这个杂志有关。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妇女界就在北四川路男青年会召开大会，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大会由史良任主席，罗琼等上台讲话。当时，台下有人高呼，要求成立妇女救国会，主席问大家是否当即成立，大家一致鼓掌通过。于是，当场由群众选出了史良、沈兹九、罗琼、杜君慧、胡子婴、韩学章，陆慧年和一位工人

为理事，成立理事会。当时，南京派了曹孟君、王枫、胡济邦等三位妇女代表来上海串连，也参加那次大会。妇女救国会发表宣言及《告全国妇女书》，指出华北事件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发生华中、华南事件；要求冲破妇女只会烧饭抱孩子的传统观念的思想牢笼，同爱国分子共同负起救国责任。

那天开完大会，天色将黑，大家一致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有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员等近千名妇女参加，我担任纠察。队伍从四川北路转弯到南京路。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准群众在南京路搞示威游行，他们出动马警队，打算冲散队伍。由于地下党组织事先布置了一些人，等候在南京路附近的一些弄堂口，当队伍走过南京路时，不断地插进来。到后来游行队伍不单单是妇女，而是男女都有，示威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声势也越来越浩大。同时，中国的、外国的记者也来了许多，如美国的史沫特莱等，她们在队伍外边来来往往拍照，掩护我们，还给马警队讲不许冲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工部局的马警队就不敢动手。队伍浩浩荡荡地冲破了禁区，胜利地通过了南京路，过西藏路桥到北火车站，又转到北四川路解散。

会后，理事会进行了分工，史良、胡子婴、沈兹九搞总务，罗琼搞宣传，杜君慧搞组织。

###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八项政治主张

妇女界首先举起救国会的旗帜，这一炮打得很响。妇女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文化界、职业界、大学教授、工人、学生界都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其中力量最强的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人主要是宋庆龄、陶行知、张劲夫、马相伯、“七君子”等人。这个组织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的，当天召开了三百多人的会员大会，通过章程，选出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发表了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第一次宣言是在该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称为《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对华北青年的救国运动表示十二万分的同情，并提出了八项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这次宣言又明确提出上次宣言中八项政治主张，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改变，而在总的救亡主张上，更具体地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

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罢免并严惩一切卖国的亲敌官吏；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要求。职业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主要是沙千里，大学教授救国会负责人主要是王造时，国难教育社负责人是陶行知。

## 上海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由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和一些大中学生救国会等团体发起，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何香凝、“七君子”、马相伯等人。这个组织有个理事会是公开的，理事会下边设干事会，则是秘密的，由各界救国会推选人员参加。干事会的成员有胡子婴、徐雪寒、朱楚辛、周光明（代表职业界）、彭文应等。国难教育社及大学教授救国会都有代表参加，名字记不清了。我是干事会的总干事，徐雪寒和朱楚辛是副总干事。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清报》两个刊物，并举行过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一万余人。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爱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很好。为了进一步联合起来，扩大力量，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到会的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多个省市的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七十多人。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明确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要求民主等。大会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七君子”、孙晓村、曹孟君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由章乃器分工搞宣传，沈钧儒分工搞组织。

## 往事重温

魏璐琦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我到达中国的上海。仅仅两年之后，我就亲眼看到了爱国青年心头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而迸发出的怒火。

也是在这两年里，我对中国人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及二者的关系，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势不两立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也有幸结识了一些外国进步人士，如：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美国妇女耿丽淑（Talitha Gerlach），陆慕德（Maud Russell）等人。当时大部分外国人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的行为，他们认为正是教训“他们的好机会”。这里的“他们”，就是指那些认为上海是他们自己的领土，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的不幸的中国人。

路易·艾黎当时是公共租界城市委员会的工厂视察员。他带我参观了上海的几家工厂。工人中有不少还只是孩子。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从早到晚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常蜷身睡在机器旁边，或机器下面过夜。安全措施根本无人过问。锅炉爆炸造成伤亡等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这些工厂，有许多是外国人，包括那些不辞跨海而进行侵略的日本侵略者办的。

这些侵略者，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吞并了东北三省。继而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向上海发动进攻。当时，只有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奋起反抗。而蒋介石政府对侵略者却不欲动一指头，好象他们的首府南京是座落在另一个星球上。鲁迅先生曾用他手中锐利的武器——杂文对国民党政府那种任人宰割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进行了犀利尖刻的抨击。

北平与东北近在咫尺，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官方对这种真实情况从来不予报道。然而这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又快又准确地传到了四面八方。所以，当时北平学生愤起反抗的消息，没多久就传到上

海。一星期之后，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上海的学生也用同一个声音发出了怒吼。

那时，我已结识了史沫特莱，一位为人民的权利不屈不挠而进行斗争的人。她事先通知我到南京路南中国国货公司附近等待。突然大批的反对不抵抗政策，呼吁民族团结的传单从楼上雪花般地飘泻下来。公共租界的警察（膀大腰圆的爱尔兰人）急匆匆爬到楼上屋顶平台，却未见人影。警察尴尬之余，看到街上有个学生挥动着一把扫帚，就以威胁“警察人身安全”为借口，向空中放了几枪，逮捕了好几个学生，驱散了群众。但是，示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广大民众已经警觉了！

上海的学生运动同其它城市一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表达全国人民愿望，反对侵略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一次，在南套（上海外国租界以南的中国居民区）召集了一次示威。那时，国民党当局不仅明令禁止上街游行，还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订了一套利落的合作制度。每次抓到中国示威者，立即转交。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示威就需要严密的组织工作和纪律性。人们先三三两两，装作散步，逛大街，外出办事等悄悄向集合地点汇拢。约定信号一发，便突然集合起来。不断壮大的队伍霎时如蛟龙般出现在大街上。待警察醒悟过来，已无计可施。于是示威者高唱着激动人心的战歌，胜利前进。《义勇军进行曲》等呼吁人们“起来”的不少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年代里产生的。示威学生为了表明他们视警察为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敌人，还不断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唤起警察的爱国心，为着国家的存亡同他们共同战斗。

有一个警察不为此情此景而感动，反而拉起枪就要向示威群众开火。我恰好正站在他的身后，急不可耐地要想出办法阻止他开枪，幸亏他的枪卡壳了。学生们趁机将他嘲笑一番，又继续前进了。然而我却突然意识到，我，做为一个外国人，虽身临险境，却根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警察即使开枪也不会伤着我。不论“骚乱”有多么严重，仅凭我的肤色，就足以在我周围筑起一座“安全岛”。

在存有治外法权的时代，一艘艘外国炮舰停泊在外滩附近的水面上。外国人显然同中国人分处两个世界。这种特殊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镇压愈强，国民党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鸿沟愈深。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学生组织了到南京“请愿”活动。“请愿”路线全部选在农村，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使他们都认识到做“亡国奴”的危险，看透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的反动政策。史沫特莱再次要我到上海郊区寻找学生组织。出乎意料，我真的找到了！他们正在一所学校，或是寺院里集会。我假称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说明我同情他们的行动，便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参加了这次集会。这样，我才认识了许锡瓚。

“请愿”队伍只走到苏州，就被迫停止了。警察把学生用绳子捆起来，塞进火车全部押回了上海。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此时，正是日本进攻上海四周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对每个爱国者有深刻含意的警告？

不久，全国救国会成立了。由史沫特莱发起，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收集有关抗战运动进展的消息。我们买了一台小型油印机，安置在四层楼我的单间寓室里。马海德大夫，汉斯·希伯（Hans Shippe，他后来牺牲在新四军前进阵地上，安葬在山东省临沂），他的夫人和我一共四个人成为“印刷工人”。印好的消息，由史沫特莱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学生组织等等。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全国救国会的两名成员；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另一位是银行家章乃器先生。不过时过不久，我们的油印材料就被两位美国人办的杂志代替了。这两位美国人是曼克斯·克雷尼奇（Max Granich）和夫人格蕾丝（Grace），来到上海创办了半月刊《中国呼声》。创刊号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杂志扉页上的《中国呼声》四个字虽然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印出，但是初期稿件全部用英文写成。为了让《中国呼声》这个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呼声”，专门雇用了一名专职翻译处理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新闻报道，其中来自东北失地的消息总是优先处理。

该杂志第一期的扉页上刊登了一张“三八”妇女节上海举行示威的照片。这次游行也有不少男人参加。第二页新闻栏内配合照片发表了详细报道：“由五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于午后一时自北四川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

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八名示威者受伤。”报导还说明，“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法。始终高呼反对侵略者的口号并把几千份传单散发到赞助的围观者手中。”

同一期还发表了巴金的小说《狗》，描绘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所受到的奇耻大辱。以后各期特稿栏内连续发表了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夏衍等人的小说和文章。书评栏内经常评论、介绍外国人写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有帮助的书籍。杂志每期都按时出版，从不拖延。但是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编辑部发表一篇启示，说明由于抗战已正式全面开始数月，已不可能继续以上海为新闻基地报道这场战争。至此，《中国呼声》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今天，重温该刊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的一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首先这篇访问记说明了鲁迅先生对待青年人的积极态度。他说：“青年学生是最敏感的战士，是解放半殖民地国家斗争中最重要的前哨兵。”其次，鲁迅还提及到肖军著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一个笔名狄克的人对这本小说的批判。鲁迅认为象《八月乡村》这类描写敌占区形势的小说出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狄克先生（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张春桥！）却将这部作品说得一无是处。

这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几天以后，在上海北站附近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当时我也在场。学生原准备抢占一列火车到南京去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不再拖延，开始抗战。这次行动使铁路运输中断数小时，但是学生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还记得那时就已从事政治工作的著名律师史良，在现场对集合在周围的群众发表了演说。而当公共租界警察的红色囚车开至车站广场铁丝网外面的时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突然变成“打倒帝国主义！”不过租界警察那群愚蠢的畜生是否觉察到这个变化，就不得而知了。

当事态发展表明，学生不可能乘火车去南京的时候，在场的学生和群众有组织地排成队伍，走出车站广场，向西出发示威游行。我记得当时李公仆的儿子，仅十岁左右，也在游行队伍前后跑来跑去。我估计他也许在排头了解到游行的目的地，就问他，“我们这是到哪去呀？”他虽然也不知道，但是他说，“我们向前，永远向前。”和他的年

龄相比，这是多么好的回答呀”

随着学生运动浪潮的高涨，我曾一度变成了个“信箱”。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第一位夫人自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将学生运动的材料寄到上海我的住处，由我转交给《中国呼声》杂志。在那样的岁月里，外国人还是有一定的活动余地给进步的政治力量一点小小的帮助。

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另外一件我不会忘记的活动，就是中国男青年基督教会在南套西门娱乐场组织的一次歌咏活动。指挥这次歌咏活动的是刘良模同志，一个努力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人。《中国呼声》在报道这次活动时说：“共有一百多名警察赶到现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捉拿带头的人。但是参加者的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决心以及领导者的勇敢使集会比较顺利地结束，而没有招致什么严重后果。”

不过这次歌咏活动，临近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当时的空气紧张起来。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警察没有带任何武器，也要了曲谱参加歌唱。但是快要结束时，突然涌进一批武装警察。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一名外国秘书（自然，比起中国人来，权威大得多！）立即催促刘良模结束集会，并用他的车将刘送回家。可是，学生们却不免有些担心。不知刘良模是真的被送回家了。还是中了计被投入了监狱。学生们就让我去打个电话问一下。法租界的大门只开了一条缝，门后又站着法国警察看守。我走到警察跟前，竭力装出一副很傲慢的样子用法语让他们带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一个电话。我的法语和那副傲慢的架子，把他们唬住了。一名法国警察很客气地将我带到电话亭旁，还替我付了电话费！我问清了刘良模的下落后，就回到还在等我的学生中间，站在椅子上高声地向大家宣布刘已经安全回家啦！这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然后，便分头回家了。一路上胜利的歌声此起彼伏。这次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年轻的外国女友。见到这一切，她为群众的组织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而赞叹不已。

对我来讲，在上海的那几年里，是我向那些在政治上和对中国国情方面的了解比我老练、熟悉的朋友们学习的阶段。这一段的经历为我其后多少年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中学联

秦建君

一二九运动前，上海的中学生已经相当活跃，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许多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社联、共青团、武自会等组织的成员，间接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许多中学生通过阅读鲁迅的著作和《生活周刊》、《世界知识》、《妇女知识》、《中国农村》等进步刊物，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第三，当党的《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爱国女中的胡文新（现名方铭）等同学，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而且还巧妙地把文件夹在图书馆的杂志中，向学生广为传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此可见，上海的中学生能够迅速而积极地投入一二九运动并非偶然，而是思想上、活动上早已有所酝酿。

## 北平代表与中学联

一二九运动爆发一星期后，北平学联在准备一二·一六大游行的同时，于12月15日派出燕京大学的陈翰伯、清华大学的陈元和韦毓梅（又名姜平、孙兰）到上海联络。他们通过邹韬奋，结识了救国运动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然后再速过他们与上海的大中学生取得联系。如陈翰伯到麦伦中学认识了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陈芝祥（现名陈明，丁玲的丈夫），韦毓梅到爱国女中认识了胡文新。胡文新又把正风中学团支部书记韩瑞芳介绍给北平代表。以后，中学联便是由这三所学校为主进行筹备的。

## 筹备成立中学联

中学联的全称为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它的筹备经过大致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为酝酿阶段，先由地下党员王翰同志召集麦伦中学的陈芝祥、正风中学的韩瑞芳、爱国女中的胡文新三人在韩瑞芳的家中开会，商讨筹备事宜。第二步，由麦伦中学的陈芝祥发出油印信件，分寄各中学，争取更多的中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第三步，举行筹备会议，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有回忆说是12月17日），会议

事先定在麦伦中学进行。不料那天下午巡捕房的包打听突然闯到麦伦中学的传达室，正巧遇着陈芝祥也来到门房间，包打听并不认识陈芝祥，反而向他询问：“陈芝祥在吗？”陈芝祥一听歪头不对，连忙机灵地答道：“陈芝祥不在校内！”于是转身通知有关人员改换开会地方，经过商定，筹备会议改在麦伦中学沈世雄同学的亲戚家中进行。这位亲戚是搞建筑业的，其家离开麦伦中学不远。地点变更后，又安排人暗暗地守候在门房间外面，一是通知会议改变地点，二是防止代表遭到包打听的迫害。由于地点变更，出席会议的学校代表比预定的少得多，到会代表主要有：正风中学的韩瑞芳、任士舜（又名任大年、张则菽）、马荣根（现名马寅）、毛××；爱国女中的胡文新、高桂芳、李林、贾唯美；麦伦中学的陈芝祥（陈明）、沈世雄、杨修严；同济附中的孙永德（现名夏印）；惠平中学的戴德章、杨惠琳。会议决定发一份宣传提纲，主要内容为：“中国为何越来越穷，我们中国人的负担为何越来越重？”等。

### 中学联在斗争中正式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来以后，第一次大的行动便是一二·一九江湾请愿。那天上午，复旦大学学生去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晚上又有暨南大学发起，大夏大学、交通大学、税务专科学校等许多高等学校的学生去请愿。

国民党政府力图控制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北京消息，日激一日，上海各大学学生群众蠢蠢欲动，在事实上已难扬汤止沸，专事抑止，徒使各校负责之学生同志（指各校的学生特务。——笔者注）在群众中日堕信誉而失其领导地位，于是决定召集全市各校负责学生同志，转变在学生群众中之领导地位，对于学生运动务使纳入轨范，专以反对华北伪自治为目标而作纯正之表示，并竭力防止反动分子之阴谋捣乱。”

暨南大学救亡活动负责人陈伟达同志回顾一二·一九请愿活动时曾明确指出，暨南大学的江湾请愿最初是“由复兴社的学生出面组织的”。“由广东人潘××军事教官任指挥”。“我们反复研究，不能让抗日救亡的旗子被国民党拿去，来个将计就计，我们参加进行，争

取领导权。游行队伍从暨南大学（真如附近）到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址）时，复兴社分子已经无法控制整个游行队伍”。无数同学还是在这次江湾请愿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

一二·一九夜，麦伦中学的陈芝祥得到大学生去江湾请愿的消息，立即赶到现场了解实情，只见在江湾国民党市政府门口黑压压的一片人群。陈芝祥立即打电话给正风中学的韩瑞芳，表示，大学生去请愿，我们中学生也要去！并且简要地研究了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中学联筹委会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中学生队伍，向江湾进发。途中遇到大学生从江湾返回市区的队伍，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去了，但是他们毫不动摇，仍然不顾疲劳，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终于到达江湾。开始，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非常轻视中学生，不予理睬。由于同学们不断斗争，教育局长潘公展被迫出面接见。中学生的请愿代表向他提出了：“要求爱国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爱国同学”等六项要求，而潘公展却进行百般诡辩，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开展了激烈的辩论，潘公展狡辩：“‘剿共’不是内战”，麦伦中学沈世雄同学站在前面操着宁波话大声质问：“这不是内战是什么？”正风中学的韩瑞芳也高声呼喊：“政府没有诚意，还在欺骗我们，他的答复我们不满意，我们要上街游行，唤醒民众”，在群众压力下，潘公展被迫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随后举行了游行，游行中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震撼人心的口号。虽然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摩托车车队虎视眈眈地尾随着游行队伍，但是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游行结束，队伍在麦伦中学操场上集合，由中学联筹备会的成员宣布上海中学联的正式成立，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

参加中学联的中学共有二三十个中学。中学联内设有一个核心，称呼不一，如主席团、常委或执委（以下统称常委）。常委共有五所中学：正风中学、麦伦中学、爱国女中、同济附中、惠平中学。具体分工是：总负责兼组织部长韩瑞芳、宣传部长陈芝祥、总交通马荣根（1936年2月又兼任组织部长）。1936年夏，韩瑞芳、任士舜、陈芝祥、孙永德、高桂芳相继毕业，中学联的主要工作由胡文新与马

荣根负责，同时代表中学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及行动指挥部。党内负责领导中学联工作的，主要是王翰、陈家康等同志。他们通过社联和抗日青年团的组织来领导。

## 中学联在救亡活动中

中学联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以下扼要介绍中学联的一点概况：在一二·二四大游行中，胡文新代表中学联出席指挥部会议，韩瑞芳、陈芝祥担任后补指挥，中学联还派出两百辆自行车组成通讯联络车队，往返在外滩——南京路——静安寺之间。1935年年底，中学联没有组织中学生去南京请愿，却效法北平“民先”的做法，到农村宣传。1936年2月8日，为纪念二七大罢工，与大学生组织联合宣传团，并发布《告亲爱的军警同胞书》，三八大游行中，胡文新与她姐姐搀扶着史良行进在南京路上。三·二五事件中，由陈家康布置，要求各中学以各自的名义去声援，以体现自发支持。五一游行中，有些同学被殴打，中学联发动同学们去医院慰问。九一八纪念中，中学生站在队伍的前列，不愿迫害，英勇地宣传救亡主张。鲁迅葬仪中，手持“民族魂”大旗，唱着哀歌，与万千群众一起，参加送葬的行列。中学生们还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声援正在罢工的日商纱厂的工人。“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们有的上法院抗议，有的到苏州去入狱……他们在救亡活动中，提高了思想认识，培养了组织能力。以后许多同志都奔赴抗日战争前线，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一二九运动中的全国学联

刘璣章 柳淑卿 秦建君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筹备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正式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底。它是全国学生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构，不仅在团结全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自己的活动还与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组织了广泛的联系。

## 成立于民族危急之秋

一九三五年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救亡热潮迅速波及全国。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各地区各阶层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先后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界也不例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平津学联成立，随即决议筹备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后便派北京大学的刘江陵（又名刘也夫、江凌）和董毓华（又名李家宗、大李）等前往上海筹建。当他们途经济南时，原北大的唐守愚被邀共赴上海，参加筹备工作。北平学联的代表抵达上海后，与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胡乔木接上关系，同时又取得上海各界救国会人士的支持，筹建工作很快展开。这时，上海地下学联派出复旦大学的裔寿民（现名伊扬）和税务专科学校的彭瑞复两人作为上海学联参加筹备全国学联的代表。三月初，北平学联派陆瑾前往上海参加筹备，另外黄敬也经常往来北平、上海之间，把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意图贯彻在筹建之中。

当时筹备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宣传工作，提出全国学联对时局的主张。刘江陵代表全国学联起草了书面文件，着重指出：“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大敌当前，民族垂危，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是组织工作，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组织。天津、杭州的学联派出的代表先后抵达上海，然后，



平、津、沪、杭四地区的学联代表七、八人，以春游太湖为名，于一九三六年春天集合在无锡风景区鼋头渚秘密召开全国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全国学联正式成立的日期，并且通过了筹备成立宣言，指出：“我们，这人类最先开化的民族，现在，是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我们愿用血和泪来唤起全中国的同胞一致抗战！”会议还决定陆瑾、唐守愚编辑出版全国学联筹备会机关刊物——《学生呼声》，宣传全国学联对抗日救亡的种种主张。会后，还按平汉、平沪、平绥、北宁四个区以及华中、华北、华南三条线由筹备会派出代表与各地学生救亡团体进行联络。

自筹委会召开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的宣传和严密的组织准备，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上海集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以及广西等学联代表共二十八人，经过两天的会议，正式成立了全国学联，并通过了《纲领》和《宣言》。《纲领》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把我们学生从课堂召唤到街头，从书本引导到斗争。”《宣言》并公布了全国学联的任务是：

“从今天起，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将勇敢领导着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将进一步团结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粉碎民族敌人的堡垒”。会议还通过了“派员赴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帮助建立组织”，

“加入世界学联”等四项重要提案。在组织机构方面，会议选举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十一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执行主席公推北平地区的代表刘江陵担任（第二任是刘导生，第三任是段君毅），陆瑾为宣传部长，董毓华为组织部长。全国学联党的工作由唐守愚负责。“西安事变”后，胡乔木去延安前又把上海地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震旦大学、持志学院的四所学校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唐守愚。

全国学联的成立，其意义正如《救亡情报》发表的《庆祝全国学联成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全国学联成立于民族危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公开的武装占领华北而更进一步地深刻化的时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 团结群众，冲锋在前

全国学联从筹备到成立以后，始终和其它救亡团体协同作战，如

刘江陵、董毓华、唐守愚等南下途经南京时，曾与南京地区的爱国人士孙晓村、曹孟君等人磋商过救亡事宜；抵达上海后，立即取得上海地区的爱国人士的支持；成立以后，在几次重大活动中，又与其它救亡团体取一致的主张和一致的行动。有许多活动全国学联还号召爱国学生冲锋在前，英勇奋斗。如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全国学联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发表了《为最近时局紧急宣言》，号召：“我中华民族已到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最后关头”，“现在，立刻就应当机立断，对日宣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全国学联不仅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各界人士“在‘团结御侮’的前提下，合作一致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全国被捕的同学及一切政治犯”，而且还派代表与其它各界一起去南京请愿。同年八月六日，全国学联和其它九个救亡团体联名致电华北将领，呼吁：“绥东事急，为自身计，亦当感唇亡齿寒之惧”，“望抗战到底，不以寸土让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期间，全国学联与其它各界一起号召：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为此，曾连续发表《上三中全会书》、《我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主张》等重要文件。为了抵制日货，反对日本浪人走私，保护民族经济，全国学联发表了宣言和告同胞书。在悼念鲁迅的活动中，在抗议“七君子事件”以及发起“救国人狱运动”中，全国学联领导广大学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国外，学联代表和全救代表一起动员杜威、爱因斯坦等国际人士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使蒋介石狼狈不堪。在“西安事变”中，学联公开声明：“中央马上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并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召开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以上种种活动说明，全国学联与其它各界救亡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全国学联为了更好地广泛宣传救亡主张，还先后出版了三种刊物：《学生呼声》（1936年5月创刊，共出版五期）、《学生报导》（1937年1月创刊，共出版三期）、《学生新闻》（“七七”以前创刊，共出版三期）。由于经费困难和国民党当局破坏，刊物停出。这些刊物，通过国内外救亡动态的报道，宣传学联的救亡主张，努力把全国学生的力量集合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起到了“开拓民族解放大道”的先锋队作用。

## 世界青年运动的重要一翼

当中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国外后，迅速得到国际学生组织的支持，代表五十多个国家的世界学联来函慰问：“对于最近学生为救国实行光荣的牺牲与斗争，表示敬意与慰问。”当全国学联正式成立后，美国学生救国大同盟来函祝贺：“我们对于你们唤起抗日救国再接再厉的工作，表示着极大的鼓励！”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日内瓦召开世界青年大会，特邀中国代表出席。全国学联得悉后，决定派陆瑾一人作为代表前往参加，出国经费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沈钧儒帮助筹划。陆瑾于八月中旬离开上海经过海参崴到达日内瓦。中国学联代表除陆瑾以外，还有正在国外的留学生和爱国侨胞也以中国学联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如留法学生陈柱天就是其中一位。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陆瑾代表中国学联向大会作报告，她说：“为了解放我们中华民族，为了不能忍受祖国被宰割，我们是不顾面对着敌人的刀尖鼎锅，站起来了”。

“我们的纲领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我们的行动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此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世界反侵略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钱俊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代表宋庆龄出席，他特地带信给陆瑾和正在国外参加会议的陶行知（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要他们两人代表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去英、美、法等国向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增强救亡力量。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世界和平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中国的学联代表陈柱天向各国代表呼吁营救救国会领袖，大会执行主席当即拟就为释放“七君子”的声援书交到会代表签字。由于全国学联代表在国外活动了几年，国内外抗日救国的信息沟通了起来，汇成力量。以上种种事实，证明中国的学生救国运动是世界青年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是世界青运的重要一翼！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时任全国学联主席的段君毅，经上级党组织领导人王翰同意，去延安汇报工作。段君

（下转第46页）